政治科學論叢／第 83 期／民國 109 年 3 月／頁 1-54

大國崛起與絲路烽煙：從隋唐經營西域看權力轉移下崛起國對小國的政策*

萬　曉**

摘　要

在美中權力轉移的時代關口，崛起國行爲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務意義。本文將權力與文化的解釋共同納入理論框架，用突厥－隋唐時期的不對稱關係檢驗假說，探討在權力轉移背景下崛起國會對不同的小國採行何種政策，什麼因素決定了它對小國的政策。隋唐對西域綠洲國家的政策證實了基於權力的核心邏輯：兩大國權力對比決定崛起國的攻守傾向，從而產生它對小國的政策基調。塔里木城邦與高昌這組最相似案例否證了文化親和度的作用。以歷史啓示審視今日世局，在實力超越美國之前，中國將保持對美國的守勢與對小國的和緩政策。

關鍵詞：權力轉移、不對稱關係、東亞體系、隋唐、西域

---

* DOI:10.6166/TJPS.202003_(83).0001
感謝吳玉山教授的悉心指導。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切要批評與《政治科學論叢》編委會的辛勞工作。一切錯謬由作者負責。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E-mail: rinchengyatso1990@gmail.com。

收稿日期：108 年 10 月 16 日；通過日期：109 年 3 月 27 日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壹、緒論

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和近年對外政策的奮發有爲，引起西方學者和決策精英的憂慮，他們多相信中國即將取代美國在東亞的主導權，進而顛覆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Allison, 2017；Art, 2010；Mearsheimer, 2010；Nye, 2010）。2015 年以來，美國國內展開大辯論，基本形成了對華強硬的共識（Blackwill & Tellis, 2015；Pence, 2018；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2018 年至今，美國多次對總值達數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增稅；中國也回應以對美國商品的反傾銷、反補貼；談判與摩擦幾經反覆，結局猶未明朗。權力轉移造成的結構矛盾日益尖銳，本研究的問題意識便源於我們身處的時代關口。

本研究試圖解釋權力轉移下崛起國對小國的政策。長期以來，國際關係與外交決策理論主要關注大國，圍繞大國互動的討論可謂「前人之述備矣」。然而，大多數國際互動發生在大國與中小國家之間，關於特定大小國互動的具體政策探討很多，但理論分析匱乏（吳玉山，2012：31-32），目前僅有的理論努力是不對稱理論（Asymmetry Theory）。其中由吳本立（Brantly Womack）提出的一脈剖析能力差距如何形塑強弱雙方的利益、認知與行爲差異（2003；2006；2009；2010；2016），但其發展日益走向規範性論述，無助於尋求因果解釋。不對稱理論的另一脈絡著重挖掘小國應對大國的各種策略選項及小國政策選擇的原因，尤其將避險作爲抗衡與扈從之間的第三選項而不斷細化（王棟，2018；吳玉山，1997；Bobrow, 2008；Ciorciari, 2008；Goh, 2007；Jackson, 2014；Kang, 2007b；2009；Koga, 2017；Kuik, 2008；Roy, 2005）。類似研究的視角以「小對大」爲主，多聚焦於小國與強鄰的雙邊互動，或小國在多個大國之間的策略抉擇。研究者常常將大國意圖作爲重要的解釋因素，卻鮮少深究大國採取某種政策的原因，關於「大對小」的討論遠遠不足。正如諸多研究所揭示的，大國的態度攸關小國的命運，與中小國家互動也是大國必須處理的課題，倘若將「大對小」納入權力轉移的脈絡下，則既切合時局，又可從豐富的大國互動理論中汲取養分並與之對話，兼具理論與實務重要性。

臺灣大學國發所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物質條件的變遷產生權力轉移的壓力，亦帶來「東亞再理論化」的契機（張登及，2015），而歷史對於瞭解中國的對外行爲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無論是民族復興的理想宣示，還是冠以絲路之名的合作倡議，都令人們很自然地聯想到歷史中國的經驗，將今日中國的崛起（rising）視爲歷次興衰後的再起（resurgence）。歷史是理論研究取之不盡的源泉，歐美研究者最重要的實證資料庫之一是主權國家與國際關係學科肇端的近代歐洲，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研究議程選擇的許多案例便來自 15 世紀以後的歐洲。然而，多極或多強的近代歐洲一旦被套用經典的權力轉移概念，立即難免尷尬，有時同期存在多個主導國（ruling power）或多個崛起國，有時所謂主導國的權力優勢尚不及霸權（Allison, 2017），顯然不甚貼近蘇聯挑戰美國的過程，也與當前美中競逐的狀況相去甚遠。相反，由於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前現代東亞長期呈現農耕與遊牧二元勢力範圍，中華王朝與草原強權此消彼長，多次出現從單極到兩極、又從兩極到單極的結構變遷，堪稱權力轉移的天然試驗場，足以提供寶貴的理論與實務啓示。

基於上述發想，本研究關注權力轉移下的大小國關係，探尋崛起國會對不同小國施行何種政策，什麼因素決定其政策。[1] 關於此問題，既有文獻從不同途徑與層次提供了多種解讀，其中，大國權力對比與大小國文化異同常被視爲重要的解釋因素。在 6 世紀中葉至 7 世紀中葉突厥－隋唐權力轉移週期內，西域綠洲的塔里木城邦與高昌構成一組針對文化的最相似案例。[2] 下文將追蹤崛起國隋唐對它們的政策變遷，考察權力因素與文化因素的效力，與既有理論對話，並審視美中權力轉移的世局。

---

1 權力轉移與崛起國和霸權國雙方都密切相關，絕大多數既有研究也同時討論二者，因此文獻回顧部分和搭建框架階段將兼顧崛起國與霸權國，以期具有更廣泛的適用性，後續研究也將延伸至霸權國。

2 隋、唐既可以被視作一體的「中國」，與突厥－東突厥的競逐形成一個有波折的週期，也可以被視爲兩個崛起國，如此便有兩個權力轉移週期，構成一組崛起成敗的對比案例：前者的崛起功虧一簣，後者崛起成功實現霸權更迭。除了隋唐－突厥以外，作者將在其他研究中探討匈奴－兩漢（與隋唐同樣經歷頓挫）、契丹－北宋（挑戰失敗）等前現代東亞的權力轉移週期，期待能通過更充足的經驗資料尋求理論與實務啓示。

臺灣大學 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貳、權力與文化的競爭性解釋

在美中權力轉移的背景下，既有文獻主要提供了基於權力與基於文化的兩套解釋，都有助於回答本文的研究問題。

一、基於權力的解釋

權力是政治現實主義的核心概念。現實主義以權力分配判斷體系結構，也常根據權力位階指稱行爲體。其中，霸權國（hegemon）多指掌握體系內權力優勢，權力遠超其餘行爲體的主導國；崛起國（rising power）的主流定義亦強調其物質權力高速成長。許多研究使用慣例（conventionally）界定霸權國和崛起國，不作細緻測量，也都著重相對經濟軍事實力的快速變化（Allison, 2017；Edelstein, 2017）。

國家間權力差距與戰爭爆發可能性之間的關聯是現實主義諸理論探討的核心問題之一，由此形成權力平衡與霸權穩定的爭辯，又衍生出國家權力位階與行爲傾向是否相關的問題。在權力平衡論一側，古典現實主義主張崛起國很可能是不滿的修正主義者（Carr, 1964: 225-226；Morgenthau, 2006: 46-53；Kissinger, 1957: 1-2）。守勢現實主義相信國家對權力的追求不超過生存所需，安全困境令主要大國都採取守勢政策（Waltz, 2000: 39-40；2010: 200-203）。攻勢現實主義則認爲，國家爲了實現安全必須使有利於自己的權力差距極大化，除了唯一區域霸權美國，沒有誰會滿足於現狀（Mearsheimer, 2001: 1-54）。作爲新古典現實主義一支的利益平衡論指出，國家的立場取決於對當下權力分配的看法，通過成本收益計算，選擇破壞、默許或支持現狀（Schweller, 1994）。這些觀點紛紛設定國家擴張權力的意圖，只有權力平衡造成的不確定結局和高額成本才能阻遏戰爭，如果增加權力收益高而成本低，大國必然選擇擴張。在認同霸權穩定的興衰現實主義（Rise and Fall Realism）一側，[3] 圍繞崛起國與衰落霸權國誰才是戰爭的

[3] 興衰現實主義包括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霸權戰爭理論（Hegemonic War Theory）、權力週期理論（Power Cycle Theory）、領導權長週期理論（Leadership Long

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

發動者，形成以權力轉移理論爲代表的多數觀點和獨樹一幟的動態差異理論兩派。在以物質能力的均勢（parity）和超越（overtaking）說明衝突發生的時間條件之餘，權力轉移理論增加「滿意度分佈」和「綜合現狀評價」等意圖因素，以預估國家間不同的合作或戰爭形式。在權力轉移論者看來，崛起國最可能同時滿足能力與動機條件，成爲戰爭的發動者；霸權國受其開創的現狀秩序所限，具備戰勝能力時缺乏動機，重拾動機時力已不逮（Tammen et al., 2002: 1-43）。相反，動態差異理論主張，崛起國只需等待就可以和平地成長，眞正發動大戰的常常是面臨衰落威脅或正在衰落而仍居於支配地位的大國（Copeland, 2000）。

針對權力分配形態與戰爭爆發可能性，以及霸權國與崛起國的戰略意圖與攻守傾向這兩項主要的理論分歧，先後有學者作出調和努力。吳玉山（2011）同時承認權力平衡論和權力轉移理論的見解，提出修正的權力轉移理論（Modified Power Transition Theory）：權力均衡時，各國因勝負難料而戰爭代價大，都不會發動戰爭；權力懸殊時，強國樂於主宰，弱國不敢挑釁，也不易發生戰爭；惟有處於均衡與懸殊之間的過渡狀態，在意圖、勝算與成本上，都缺乏阻遏戰爭的因素，故而相對不穩定。由此可知，在權力分配形態的均衡與懸殊兩端，各國都傾向於維持現狀；但我們無法推論，在不穩定的過渡狀態中，霸權國和崛起國誰會點燃戰火。恰好，時間視野理論（Time Horizon Theory）提供了洞見。埃德爾斯坦（David M. Edelstein）將崛起國發動霸權戰爭與霸權國發動預防性戰爭視爲不同時間視野組合的結果。他相信，由長短期內機會和威脅的平衡所決定的時間視野——關注與評估的長期或短期程度——影響領導人的策略，現有大國總是面臨「現在還是稍遲」（now-or-later）解決潛在威脅的困境，它並非簡單地設想崛起國的最糟意圖，而是不斷地試驗、評估，如果崛起國保持意圖不確定，就可能實現有利於成長的短期合作。總體上，國家越關注短期，越傾向合作；越擔心他國的長期意圖，越不願合作（Edelstein, 2017: 10-37, 151-162）。埃德爾斯坦在權力和意圖維度之外引入此前不爲國際政治研究

Cycle Theory），以及動態差異理論（Dynamic Differentials Theory）（Elman & Jensen, 2014: 205-2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所重視的時間維度，精妙地解釋了短期決策問題。然而，三重維度並非相互獨立，權力轉移依然可能牽引霸權國越來越用長視野審視崛起國，將其意圖判斷爲惡意，令理論的能動色彩再度黯淡。

與圍繞競逐中大國攻守傾向的諸多爭辯相比，涉及「大對小」政策的論述很少，卻常常不約而同地相信，爭奪小國是大國競逐的重要內容。例如科普蘭（Dale C. Copeland）提及，崛起和衰退的大國都要經歷一段艱難時期，把足夠的新生國家納入自己一邊，從而改變本集團的相對權力地位（Copeland, 2000: 259）。秦亞青（2008）發現，在霸權週期內，霸權國最重要的利益是護持霸權，即維持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權力距離，爲此會在國際武裝衝突中支援體系次強（挑戰者）的敵人，以及區域主導國（潛在挑戰者）的對手。楊原關注兩極體系下大國能否發揮對外功能，滿足小國的安全保障、經濟利益、糾紛仲裁以及合法性認可等需求，獲取影響力，循此提出大國通過差異化競爭實現共治的機制（楊原，2017；楊原、曹瑋，2015；Yang, 2018）。科普蘭與秦亞青使用作爲資源的權力，暗示大國會將小國視爲增加自身權力、削弱對手權力的重要工具。楊原使用作爲關係的權力，強調影響力對於大國霸業的意義。無論何種權力概念，爭取小國對於大國贏得競逐都不可或缺。[4]

---

[4] 在同盟理論中，斯奈德（Glenn H. Snyder）以結盟的體系模型（A Systemic Model of Alignment and Alliance）解釋聯盟的形成，也提及權力不對等。他認爲，結盟的激勵和阻礙受到國際體系結構、主要國家之間的力量不平等以及特殊衝突和共同利益影響。其中權力差異會左右國家的戰略利益與結盟動機。通過分析多種權力配置情形下的結盟組合，斯奈德認爲，面對強國威脅的弱國結盟最有價值，而強國結盟對抗弱國最無價值；當一強一弱結盟時，若（共同）對手較弱，聯盟中的弱者將享有更多利益；若對手強大，聯盟中的強者將獲得更多好處。四種權力配置情形裡最貼近權力轉移的是三國不等（A>B>C 且 A<B+C）與兩強一弱（A<B=C）。兩強一弱下，BC 毫無結盟動機，兩強聯盟也不具價值，弱國 A 可以通過追隨任一強國獲得保護，結盟動機也很弱，B 或 C 則通過與 A 結盟增加安全保障。三國不等下，兩個較強國家 AB 結盟的價值爲負，較弱國家 BC 聯盟則頗具價值（Snyder, 2007: 1-78）。然而，斯奈德的著作開宗明義地宣示多極體系背景，他納入權力不對等，是放鬆原始模型中諸國權力相等的假設，以更貼近現實。在他的設置中，所謂不對等僅是適度差距（moderate differences）。而且，即使在權力不對等的聯盟中，盟國也履行集體安全的同等承諾，弱國通過追隨強國獲取單方面保護不同於結盟。這暗示，模型中的弱國（weak state）更多地是諸大國中較弱的一方，其向背足以衝擊其他大國間的權力平衡。作爲守勢現實主義的一支，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用資料庫

總體而言，以體系視角爲主的現實主義理論凸顯了頂層大國的世界觀，尤其展示權力因素的至要作用，有助於理解給定權力分配下大國的整體戰略。但既有研究對於霸權國與崛起國的行爲傾向各執一詞，本文必須選取合適的立場。同時，關注大國競逐的文獻鮮少談及小國，僅有的討論亦未深究大國的競逐會如何影響它們對小國的政策，本文正將對此做出解答。

二、基於文化的解釋

伴隨中國的崛起，解讀中國行爲的迫切需要越來越凸顯國際關係研究漠視非歐美概念與經驗的尷尬（Buzan & Little, 2000: 1-19）。當研究者考慮前現代東亞的概念與經驗時，便浮現出一個關鍵問題——中國的對外行爲有多少可以用源自西方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解釋，又有多少受到其獨特文化的影響（吳玉山，2018：5）？

一些論述著眼於傳統中國的戰略文化。如張鐵軍的文化道德主義（Cultural Moralism）認爲傳統中國在規劃安全戰略時秉持儒家的德、仁、義價值，重視道德感化與制度吸引，具有愛好和平的本質（Zhang, 2002: 73-90）。相反，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文化現實主義（Cultural Realism）主張，傳統中國的戰略文化與西方別無二致，本質上是強調備戰（parabellum）的強現實政治（hard realpolitik）（1998）。王元綱也發現，權力政治足堪解釋宋朝、明朝的對外行爲，儒家文化並未發揮指導作用（Wang, 2011）。王俊評（2018）同樣主張，華夏文明的戰略文化雖是內政導向，卻信任武力在國際關係中的效用，決策精英陽儒陰法，戰略思維經常充滿濃厚的權謀計算。在兩種極端看法之間，時殷弘（2011）相信，中國有克勞塞維茨式決戰決勝與大規模遠征的歷史經驗，但在深刻的文化意義上更傾向於孫子式或儒家的戰略傳統，即爭取代價最小化而非收益最大化。

另一些國際關係學者從中華文化提取核心概念，試圖補充甚至挑戰現有「西方」理論。如閻學通（2015；2018）的道義現實主義（Moral Realism）雖接受權力是最主要的國家利益，卻提出由領導類型決定的戰略信譽（國際

同盟理論各派的重點是平衡而非競逐，不考慮單極體系，不討論權力轉移，更不會眞正關心權力懸殊的大小國關係，因而與本文主題相去較遠。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道義）對增強或削弱國家權力至關重要。與閻學通不同，秦亞青、石之瑜以作爲中華文化特質的關係（relationship）爲內核，發展迥異於現實主義的中國式理論。秦亞青（2012）的過程建構主義（Process-oriented Constructivism）認爲中國特有的中庸辯證法可以促進包容，實現共享規範，達成整體和諧。石之瑜的關係平衡論（Balance of Relationship）則相信中國決策者關切長期穩定的互惠關係，爲此秉持自我克制，以非武力手段爲首選政策（Huang & Shih, 2014: 22）。很明顯，在這些理論中，中華文化也令中國對外政策具有仁愛、和諧、克制的特點。

前述觀點多著重中華文化的內容對中國整體行爲傾向的影響，但本文無意比較中國與其他大國的政策區別，而是試圖解釋大國政策在不同小國間的變異。就此方面，另一些逾越中國本身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見解。這些研究認爲，中國主導下的前現代東亞具有獨特的秩序與原理——以中國爲中心，恪守中華優越，將層級制和圈層結構的國內政治與社會原則延伸到國際。圈層歸屬的標準涉及地緣、種族，但主要還是文化：接受中華文化的朝鮮、越南、琉球與日本（短暫時期）屬於漢化圈（Sinic Zone），種族與文化均與中華不同的遊牧或半遊牧民族屬於內亞圈（Inner Asian），關山阻絕、遠隔重洋的「外夷」則屬於外亞圈（Outer Asian）（Fairbank, 1968: 2-13），中國與不同圈層國家的關係呈現不同特點。當代研究者發現，相較於戰火綿延的歐洲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明清中國與朝鮮、越南和日本之間僅發生過兩次大規模衝突（Kang, 2010），這主要是由於中華文化的浸淫（楊仕樂，2017；2018），至今，儒家和平的遺產仍促使東亞各國選擇適應而非抗衡中國崛起（Kang, 2007a；2010）。追溯古代經典論述，士人常認爲「蠻戎夷狄」（非華夏族群）「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班固，1962：3833），「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吳兢著，駢宇騫譯註，2011：603），「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范曄，1965：2912），以故「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蘇軾，孔凡禮點校，1986：43）。「聖王制禦蠻夷」的手段是，政治上「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軍事上「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即使蠻夷歸附，中華王朝表面「接之以禮讓」，實際加以防範，「羈靡不絕，使曲在彼」，避免以夷變夏（班固，1962：3833-3834）。上述消極態度迥異於經典論述中的朝貢制度，其對象顯然多

臺灣大學 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指內亞圈「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的遊牧民族（班固，1962：3833）。總體而言，因接受中華文化程度有別，東南方向海外朝貢國和西北方向內亞遊牧國家與中華王朝的關係呈現不同特徵——前者構成對天下的認同性共建，武力侵擾和征服討伐次數有限；後者構成對天下的對抗性共建，武力侵擾和征服討伐特徵明顯（李揚帆，2015）。

目前，將上述圈層邏輯引入國際關係研究的理論化努力主要有尚會鵬的心理文化學（Psycho-culturology）和張鋒的「大戰略關係理論」（A Relational Theory of Grand Strategy）。尚會鵬將古代東亞國際秩序（即「服國」或「禮的秩序」）視爲中國「倫人」式「基本人際狀態」的延伸，同樣體現「差等愛」的理念，受到「角色原理」的支配，並適用人際關係的三層圈子。「親人圈子」通行「親情法則」，成員相互完全信賴、相互無條件幫助，包括歷史上的邊疆土司與朝鮮、越南。「熟人圈子」通行「人情法則」，成員相互有條件幫助，覆蓋秩序中大部分行爲體。親人與熟人圈內的互動強調道德義務，必然內斂而溫和。而在鮮少接受中華文化的「生人圈子」裡，「角色原理」不起作用，中國對生人缺乏感情投注，或漠不關心，或公平游戲（尚會鵬、游國龍，2010：463-484）。從人類心理學家許烺光的著述發展而來的一整套心理文化學涵括極廣，主旨在於比較不同文明的基本人際狀態，凸顯非西方「間人」社會與西方「個人」社會的差異（尚會鵬，2013），涉及國際層面的論述缺乏實證支持。相較而言，張鋒則與秦亞青、石之瑜一樣，發展以「關係」爲核心的國際關係理論，而且也納入了角色與親緣概念。張鋒認爲，古代中國與東亞鄰國的互動不乏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自利算計，卻更以儒家關係主義的情感理性（expressive rationality）爲特徵。情感理性追求互動過程本身的情感滿意與倫理適當，最重要的原則是源自儒家親緣家庭主義（kinship-based familism）的「尊尊」、「親親」——在君父與臣子的角色分異下，中國致力於建立層級關係，在分配資源時爲親近者提供比疏遠者更優厚的待遇。而中國判斷親疏的標準，便是其他行爲體文化與中華文化的相似程度，即文化親和度（affinity）（Zhang, 2015: 1-46）。然而，張鋒將關係中利益衝突的程度設置爲在工具理性或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感理性間抉擇的促成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爲理論帶來內在矛盾，[5] 他對明代前期與朝鮮、蒙古、日本互動的案例分析也顯得尷尬：明朝將層級秩序施加於人，除了朝鮮長期認同以外，蒙古、日本的應對策略多屬於工具理性（退出、進入、順從）（Zhang, 2015: 47-152）。理論缺陷與實證結果使原本富於新意的情感理性略顯失色，但欲以文化因素解釋中國政策在小國間的變異，文化親和度概念便頗堪借鑒。

總而言之，多數根植於歷史經驗與文化資源的研究強調中華文化特質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若將焦點從中國整體戰略傾向轉向對不同國家的政策差異，會凸顯文化相似程度的意義——中國更可能對文化特質與其相似的小國使用德化、輸送利好，對文化與其差異較大的小國使用威服、加以防範。[6] 不過，也有不少研究否定了中華文化和平仁愛的特殊性或這種特點對外交的作用，因而下文將文化親和度納入理論框架，與權力因素共同接受實證檢驗。[7]

---

5 「大戰略關係理論」融合西方與中國式的關係主義，內涵十分龐雜，其主軸是將前現代東亞的中國霸權視作世界歷史上國際霸權的獨特形式，認爲其本質結構是促成普遍倫理的道德目標、以小事大的關係理性原則和程序合宜的體系規範，基於這些特徵而形塑不同的制度實踐。所謂以利益衝突程度（the degree of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a relationship）作爲促成條件，指的是「利益衝突越高，利益計算的需求越多，工具理性就越強烈；利益衝突越低，倫理考慮的空間越大，情感理性越強化」（Zhang, 2015: 37）。但無論如何界定「國家利益」，「判斷利益衝突的程度」該行爲本身就與自利的工具理性密切相關，使得這一推論成爲無法證僞的套套邏輯。而且，該設計意味著行爲體一般首先使用工具理性，唯當情勢無關緊要時，才會驅動情感理性，更削減情感理性的意義。

6 將文化特質異同與行爲體間和戰聯繫起來的觀點也見於民主和平論、文明衝突論與溫特建構主義，因而關注文化相似或相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適的理論價值。但著重文化異同不等於忽視文化內容，溫特強調，文化在分析意義上是中性的，康德文化與霍布斯文化同樣是文化事實，共享朋友認知會相互親善，共享敵人認知則會相互廝殺（Wendt, 2014: 141）。尚會鵬也與溫特對話，認爲中華王朝與親人圈及部分熟人圈的成員擁有更多共享知識，形成君臣父子兄弟的角色，令互動更可能遵循仁義忠孝的倫理（尚會鵬、游國龍，2010：463-484）。但在尚會鵬看來，溫特的三種文化是「個人」社會中競爭性人際關係的延伸，與東亞圈層的三種文化源自不同的基本人際狀態。如果接受這種觀點，則東西方行爲體「因接受內容更和平的文化而產出更和平的行爲」這種相同表現實際上基於不同的文明。

7 其他文獻提供了延伸關係、小國權力、地緣位置等可能影響大國對小國政策的因素（Biddle, 2001；Dittmer, 1981；1987；Mearsheimer, 2001: 83-137, 267-333；Walt, 1990: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參、理論假說與研究方法

基於權力與基於文化的解釋幾乎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無法直接比較。爲求簡約，下文從基於權力的解釋出發搭建理論框架的主幹，而將基於文化的解釋簡化爲「小國與崛起國文化親和度」這一單元因素。

一、理論架構與假說

體系視角凸顯了權力分配對大國行爲至關重要的影響，體系大國的注意力集中於相互競爭，並據此評估其他關係。作爲體系中的首強與次強，霸權國與崛起國的行爲更受到各自權力位階和雙方權力對比的深刻形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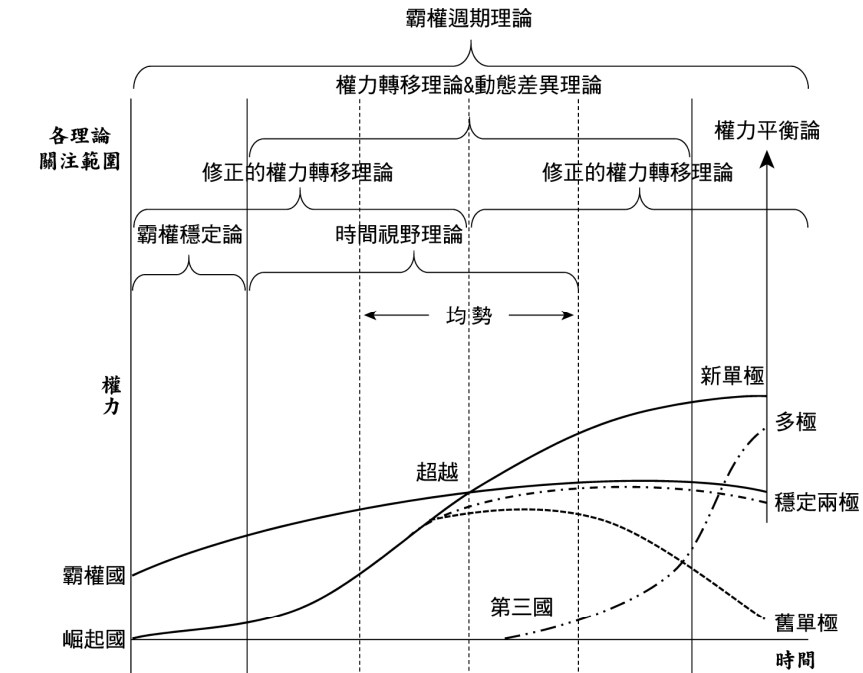
現實主義諸理論對霸權國和崛起國的行爲傾向解讀各異，主要源於它們所偏重的不同權力分配形態與經驗素材，各派固守自己樂見的穩定常態，將其他形態拒斥爲反常。但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各種權力分配形態並非相互割裂、水火不容。從時間維度看，它們相繼維持、相互轉化；從空間維度看，它們在體系或區域的不同範圍內共存。當觀察者調整時間或空間視野，便會看到不同的重點，產生對立的理論觀點。將不同理論置於同一條時間軸，可以發現它們各自的著力處（見圖 1）。與既有理論相比，本研究著眼於一對霸權國與崛起國互動的完整週期，期間呈現不同的權力分配與權力對比形態，有助於根據各理論的偏重借鑒合理觀點。

現實主義諸理論針對國家目標的分歧，亦可通過置入不同權力分配形態而化解。在權力平衡論一側，古典現實主義出於人性惡而將權力視爲國家追逐的主要目標，而結構現實主義則認爲權力不是目的，只是實現安全的手段。其中，守勢現實主義一再強調，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的最高目標是安全，過多權力會引發制衡，權力平衡是維持安全的最優機制，以故不僅拒絕單極體系出現的可能，還將所有大國都看作現狀國家。但沃爾茲（Kenneth Waltz）也說，「當生存得到保障，國家才能安全地追求安寧、福

10；Womack, 2010: 371-404；Wu, 1996；2005；2011），它們的作用有待後續探討，本文將控制它們的潛在影響。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　權力轉移週期



體系結構	單極	單極→兩極	兩極	兩極	兩極→新單極	新單極
相對權力位置	霸權國獨強	霸權國優勢	均勢霸權國略強	均勢崛起國略強	崛起國優勢	新霸權獨強
相對權力差距	大	大→小	小	小	小→大	大

說明：表格僅呈現挑戰成功（實線）的情況。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利和權力等其他目標」（Waltz, 2010: 126）。攻勢現實主義則主張，大國爲了實現安全，必須最大限度地獵取權力，將區域霸權、財富最大化、超強的地面力量以及核優勢作爲目標（Mearsheimer, 2001: 138-147）。在興衰現實主義一側，霸權國與崛起國都以霸權地位爲目標，權力轉移理論和動態差異理論的分歧在於手段的安危與得失。時間視野理論更展示，無論是霸權國試圖甄別多重威脅的輕重緩急，還是崛起國試圖保持自身意圖的不確定，都是爲了避免權力流失、維持權力成長。倘若安全獲得保障，現實主

臺灣大學國際研究生資料庫

義各派關於國家目標的看法便趨於一致——國家將以由相對權力定義的地位作爲主要目標。在各派共享的無政府狀態前提下，國家所承受的安全壓力與權力差距正相關。以動態視角審視，隨著體系內權力分配形態及國家權力位階發生變動，國家的安全壓力會改變，目標排序也會相應變化。如此一來，當固定在本文所關注的權力轉移情境，就不難推論，崛起國與霸權國都具有相當充沛的權力，比體系下層的國家獲得更多安全保障；同時由於權力分配急劇變動，雙方也都日益關切地位目標——霸權國護持霸位的需要更加急迫，崛起國取代霸權的雄心與日俱增。

表 1　權力轉移下大國的行為傾向

		國家意圖	
		崛起國 取代霸權	霸權國 護持霸位
戰爭勝算	高	攻勢 （發動霸權戰爭）	攻勢 （發動預防性戰爭）
	低	守勢 （韜光養晦）	守勢 （尋求接觸與合作）

說明：括弧內是可能的行為。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通過固定理論的適用情境——權力轉移，並將權力轉移週期劃分爲若干權力分配與對比形態，我們得以調和既有理論的分歧，整合合理分析。從單極走向兩極早期，霸權國權力超群，安全高枕無憂，雖有護持霸位的目標，卻因難於甄別主要對手，故樂於享受霸權秩序的利好，偶爾打擊潛在挑戰者；未來崛起國尚處於追趕階段，其目標以保障安全爲主，謀求發展爲次，故而力求通過韜光養晦與霸權合作，實現更快成長。當崛起國成爲唯一次強，體系結構兩極化，權力對比進入均勢而霸權國略強，霸權國日益關切護持霸位，急於遏制崛起國，由於權力位置占優，預期勝算高而損失低，更可能採取攻勢，率先發動預防性戰爭；崛起國在維護安全的前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提下有心取代霸權，著力維持崛起，因爲權力位置居劣，預期勝算低而損失高，更傾向採用守勢，通過保持意圖不確定規避打擊，或在防禦戰爭中取勝，挫敗霸權國先發制人的圖謀。當權力轉移度過「超越」節點，進入均勢而崛起國略強，霸權國更焦灼地挽救衰敗、爭取逆轉，但因權力位置居劣，預期勝算低而損失高，行爲傾向轉變爲守勢，只能間或發動小規模戰爭；崛起國則迫切壓制霸權國、防止逆轉，由於權力位置占優，預期勝算高而損失低，行爲傾向轉爲攻勢，可能發動霸權戰爭。在均勢中，由於權力差距小，權力對比可能消長，霸權國與崛起國激烈競逐，時攻時守，預防性戰爭與霸權戰爭都可能發生多次，但總體上應是優勢者採取攻勢，劣勢者採取守勢。權力轉移的結局是開放的。倘崛起國挑戰成功，便進入典型權力轉移週期的尾聲：相對權力差距大，崛起國佔據絕對優勢，體系結構從兩極邁向新單極。此時舊霸權國的首要目標轉變爲保障安全，希望規避毀滅性打擊；崛起國的主要目標則是實現霸權更迭，爲此採取全面攻勢，推展自己主導的新秩序。若崛起國挑戰落敗，體系將回歸原霸權國主宰下的舊單極，此時霸權國的需要鞏固或重建舊秩序，嚴防崛起國再起或出現新崛起國。在均勢狀態中，霸權國與崛起國也可能通過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或相互確保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等機制，固化權力相近的結構，進入長期和平的兩極平衡（balance）。[8] 此時兩強的安全亦得到相當保障，它們會以維持現有首強或次強地位爲主要目標，防範對手顛覆、自身衰落或其他國家破壞。在兩強競逐或對峙之外，還可能有其他中等大國或小國興盛，躋身大國之列，使體系結構呈現多極，經由多極競逐走向的新的兩極或單極。在這種複雜情況下，原本的霸權國與崛起國也會產生複雜的目標與行爲，既可能試圖利用新崛起國使權力平衡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變動，也可能擔憂新崛起國挑戰自己的地位而出手遏制。

8 在權力轉移理論中，均勢（parity）發生在權力轉移的過程期間，而在權力平衡論裡，作爲客觀態勢的均勢（balance）乃是一種體系內各大國權力大致相等的持久狀態，經典的表現是兩極。例如，二戰後美蘇間長達 40 餘年的冷戰，被視爲兩極體系下通過核恐怖平衡維持和平的唯一經典案例。但亦可將蘇聯視作美國單極霸權下的崛起國，經過漫長的均勢，最終因蘇聯的崩解實現了美國的勝利。在動態視角的均勢下，時而蘇攻美守，時而美攻蘇守，區域熱戰頻發，世界難稱和平。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用索引

上文根據權力轉移週期的不同階段採納既有理論的合理觀點，推論權力轉移下大國可能如何競逐，下面我們來看看大國競逐會如何影響它們對小國的政策。在權力轉移週期內，大國爲了實現各自目標，必須爭取權力分配向有利於本國的方向變動，阻止權力分配向有利於對手的方向變動，爲此它們利用小國的途徑主要有內部平衡、外部平衡與建立層級秩序。第一，內部平衡是將一些小國納入直接控制，以汲取資源、壯大權力，此時小國成爲被佔領國甚至大國的領土。征服的代價固然高，卻總能令權力平衡向有利於征服者的方向改變（Mearsheimer, 2001: 147-152），而且就本文所關注的前現代而言，爲了壯大權力，控制財富生產地比提高自身生產效率更加立竿見影。第二，外部平衡是指與小國組建聯盟，共同抗衡對手，使小國成爲盟友。雖然國際關係理論討論的多是大國之間的聯盟，但理論家並未忘記，在歷史實踐中，大國還是會考慮與小國結盟，而且受到生存威脅的中小國家還可能建立「眾弱同盟」。第三，霸業不僅意味著權力超群，還具有領導（leadership）與治理（governance）的意涵，霸業的建立、維繫與轉換都涉及將更多小國納入大國主導的陣營（陳欣之，2010；2011）。在權力轉移週期的各階段，崛起國都可能對部分小國施加影響並掌握主導權，霸權國則必須耗費更多資源避免小國轉換陣營，在對抗的陣營中，小國的角色位於被佔領國與盟友之間，或可稱爲附庸。兩極化趨勢使兩大國如磁鐵一般吸附體系內的中小國家（Rapkin et al., 1979: 271-272），霸權更迭的過程正是崛起國領導的小範圍層級秩序提升、拓展到整個體系的過程。上述三種利用小國的方式意味著對小國施加的不同程度的控制，以故不僅受大國在各階段的目標與權力影響，還可能爲小國的特徵所左右。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認爲，競逐中的大國從相互關係出發選擇對小國的政策，大國在權力對比中的地位決定它面對競逐對手的攻守傾向，進而決定它對小國的政策基調。[9] 據此產生假說 1：

當崛起國在權力對比中居於劣勢時，會在競逐中傾向守勢，對小國的政策基調和緩；當崛起國在權力對比中佔據優勢時，會在競逐中傾向攻勢，對小國的政策基調強硬。

9 此推論可能適用於霸權國，本文暫不處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該因果鏈條有兩個環節，主要連接機制皆是權力平衡。在「權力對比→大國攻守傾向」環節，如表 1 所呈現，隨著大國的目標固定，它們的相互攻守傾向僅取決於勝算和預期損失。在「大國攻守傾向→大國對小國的政策基調」環節，當大國採取守勢時，它不僅須將多數權力資源投注於應付對手，而且相對於中小國家的權力優勢未必充足，以故權力較不足以對小國施行高度控制，而守勢中的大國也更需要利用小國實現外部平衡；當大國採用攻勢時，其權力更足以支持對小國的高度控制，亦需將更多小國納入層級陣營甚至實現內部平衡。

測量行爲體的權力，以軍隊規模與武器裝備爲首要標準，經濟、人口、內政情況、疆域面積爲輔。人口與財富是軍事權力的原動力，但它們與軍事權力之間存在鴻溝。古代中華王朝擁有東亞乃至全球最多的人口和財富，卻不足以保證其始終居於主導地位。相反，由於畜牧業直接提供冷兵器時代最重要戰爭工具——馬匹，遊牧國家將經濟資源轉化爲軍事權力的效率遠高於農業國家，才支撐起一個又一個草原強權。因此，考察前現代案例必須特別重視軍事權力，特別是騎兵。將潛在權力轉化爲實際權力還涉及政府從人民中擷取資源的政治能力，它與經濟發展程度相關，更受政權控制強度的影響，以故我們也須注意國內政治結構的變動，尤其內亂無疑會嚴重削弱國家的權力。此外，疆域面積不僅直接涉及人口與財富規模，也反映軍事擴張的成果，可以作爲國家權力的直觀標準。

根植於中國歷史經驗與文化資源的研究強調中華文化特質對其行爲的影響。如果相信傳統中國在基於親緣的圈層秩序下施行尊尊與親親原則，便可以提出基於文化親和度的假說 2：[10]

> 崛起國會對與其文化特質相近的小國採取更和緩的政策，對文化相異的小國採取更強硬的政策。

根據文化相似程度判斷親疏敵友，具有一定普遍意義，而在前現代東亞的脈絡中，文化親和度發揮作用的機制是華夷之辨。本文以中華與草原二分法歸類大國的文化屬性，從而將小國的文化特質劃分爲更接近中華文

[10] 此假說主要針對前現代與當代中國，後續也會延伸至非中華文化的大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化、更接近草原文化、與中華文化和草原文化均不同三種情況。行爲體的文化特質通過種族、語言文字、風俗信仰、國內制度等指標測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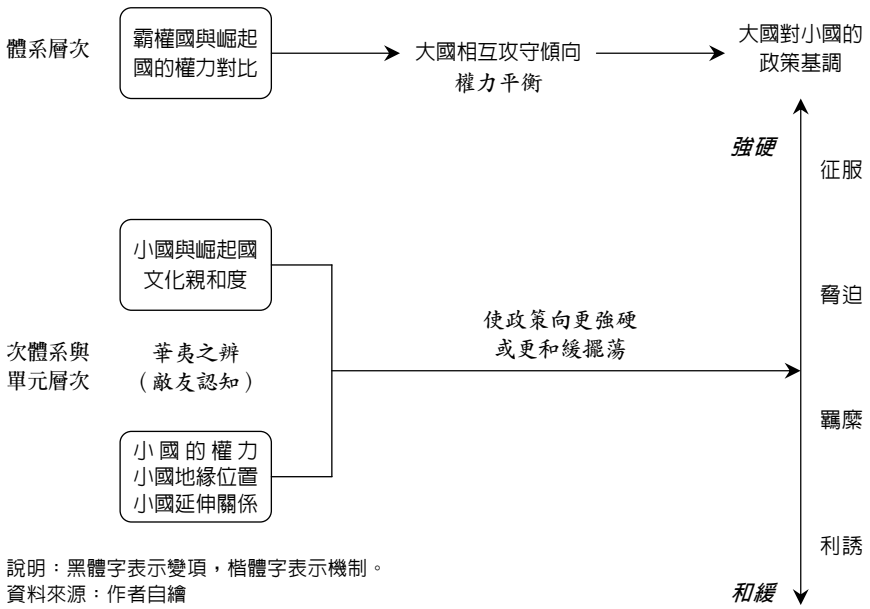
既有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國家間互動策略選項，尤其米爾斯海默與唐世平歸整了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的策略群（Mearsheimer, 2001: 147-167；Tang, 2010: 97-127），但均未明言哪些策略更可能在「大對大」情境中發生，哪些又是「大對小」可能採取的政策。我們需要整合相關討論，篩選大國對小國的可能策略。當大國的主要目標是獲取權力，政策選項有征服、脅迫、誘捕（bait and bleed）與坐觀血腥廝殺（bloodletting）。成本與勝算考慮令征服與脅迫更適用於「大對小」而非「大對大」。誘捕與坐觀血腥廝殺的重點在於促使對手彼此消耗，因此更適合用於三強相爭。由此征服與脅迫被保留作爲大國採取攻勢時對小國的策略。當大國的主要目標是應對威脅，往往以利誘或羈縻組建抗衡聯盟。如果盟國是大國，卸責的傾向會很強，而向小國卸責常常無法達到嚇阻效果，以故卸責被排除在「大對小」情境之外。至於預防性戰爭、主動遏制、被動遏制、接觸、安全合作，乃至不作爲、綏靖都是防守者針對威脅者的「大對大」策略；而避險、中立、適應、扈從則屬於不對稱理論反覆探討的「小對大」情境。這樣，只有利誘與羈縻可以作爲大國採取守勢時對小國的策略。征服與脅迫可歸入強硬一類；利誘與羈縻可歸入和緩一類。它們的定義如下：

- 征服（conquest），指的是通過戰爭侵占資源、領土、人口，消滅或分割戰敗國（Mearsheimer, 2001: 147-152）。最極端的征服是兼併。
- 脅迫（blackmail），指以強制威脅而非實際武力令對方屈服（Mearsheimer, 2001: 152-153）。
- 羈縻（jimi/halter），意味著僅約束小國的行爲，在一定範圍內任其自由（吳玉山，1997：221）。[11]
- 利誘（benefit/carrot），是通過提供好處換取對方的順服，實現互惠（楊原、曹瑋，2015：45-46；Yang, 2018: 212）。

[11] 羈縻的傳統英譯是 mollification，此譯法過於偏重安撫甚至綏靖讓步的意涵，故不採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　理論架構圖



說明：黑體字表示變項，楷體字表示機制。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歸整戰略選項，並非欲將因果邏輯直接牽入這些細目，而是爲案例分析提供若干可供使用的概念。任何具體政策都可以在從強硬到和緩的光譜上定位，相較於政策選擇的類別與名目，我們在意的是「更強硬」與「更和緩」的變動趨勢。

二、研究方法與案例選擇

本文選擇 6 世紀中葉至 7 世紀中葉的突厥－隋唐權力轉移週期，以隋唐與若干中小行爲體的互動作爲子案例。由於政策隨時間變動不居，本文無法如許多比較分析研究那般在案例選擇階段根據某種結果是否發生而挑選正負案例，而必須詳實地考察歷史。[12]

[12] 作爲政治學國際關係領域的研究，本文以歷史作經驗材料，以故只需勾勒史實，而不作詮釋討論或與隋唐史研究對話。所徵引的史料主要是《隋書》（魏徵、令狐德棻，1973）、《舊唐書》（劉昫，1975）、《新唐書》（歐陽修、宋祁，1975）與《資治通鑒》（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1956）等古典史籍，並比對它們的記載，以避免遺漏偏

臺灣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近代民族觀、主權觀東漸之前，東亞的政治界限、族群界限與文化界限縱橫交錯，給當代國際關係概念的適用造成困難。在進入實證案例之前，現就若干概念與前提假定略作說明。首先，需要界定「東亞體系」的範圍與排序原則。東亞體系的範圍是一片固定的自然地理區域：北及西伯利亞，南抵中南半島，西越帕米爾高原，西南至喜馬拉雅山，東臨太平洋，包括今天地理上的東北亞、東亞以及部分中亞、東南亞、南亞地區，我們將聚焦於這片區域內互動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較強的少數代表性國家。我們主張，前現代東亞體系與當代國際體系一樣，以無政府狀態爲排序原則。雖然古代中國期許層級制國際秩序，但這片廣闊地理空間的歷史展示，中華王朝主導的「朝貢體系」僅是整個東亞體系下的次級秩序，況且朝貢關係常常名不符實（萬曉，2017）。其次，需要明確東亞體系內行爲體的性質。我們認爲，無論前現代東亞的帝國、王朝、部落、城邦與當代民族國家差異幾何，只要具備自主決定對外政策的功能，都可視爲一元理性行爲體，是國際體系內的相似單元。最後，需要區分東亞體系下的「國內關係」與「國際關係」。判斷內外的首要標準當然是歷史政權的疆域和政治控制程度。歷史上，今日的中國領土內曾出現過許多獨立行爲體，而今日是外國領土的一些地區曾長期受中華王朝管轄。然而，我們也不能將所有獨立行爲體的互動都視爲國際關係。歷代王朝的政治控制贏縮不定，但歷史中國有一個穩定的核心，地理上大致等於秦朝疆域，即今天長城－河西走廊東端－青藏高原東緣－雲貴高原東北、東南緣與南海、東海、黃海、渤海海岸線圍成的區域——近代以來被稱爲「中國本土」（China proper）。自秦漢時期，該核心區內的制度、文化、族群便已高度同質化，而在核心區以外，歷代王朝往往只能施行政治控制，卻難以實現制度趨同與文化趨同（葛兆光，2017）。秦漢之後，當這片政治－文化共同體分裂時，其中各個獨立行爲體的縱橫捭闔表現出許多國際關係的特點，卻共享一系列核心區內部才有的行爲邏輯——行爲體大多自居「中國」、「正統」，互不承認合法性；都

頗。部分史事採用今人通過分析史料或考古發掘提出的觀點，權作補充，主要參考著作是吳玉貴（1998）、薛宗正（1992）、林幹（2007）、周偉洲（2006）。只要今人尚未發現有力的顛覆性證據，便採信史籍。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秉持「大一統」目標，互不承認生存權。以故我們必須將這種情況視爲歷史中國的「國內關係」，才能避免案例選擇偏誤。結合歷史中國頻繁變動的王朝疆域與相對穩定的政治－文化共同體範圍，可以判斷，兩漢與匈奴、南越、西域綠洲城邦、西南夷、西羌的互動，隋唐與突厥、吐蕃、回鶻、吐谷渾、高句麗的互動，兩宋與遼朝、金朝、西夏、大理、高麗、交趾的互動，明朝與北元、瓦剌、韃靼、後金的互動都屬於**當時的**（粗體爲作者所加）國際關係；相反，儘管魏蜀吳、南北朝、五代十國，以及王朝更替期間許多割據政權也是獨立行爲體，但它們的主體在政治－文化共同體「中國」以內，行爲受到「正統」與「大一統」邏輯的強烈驅動，應該被視爲分裂格局下的國內關係。

爲了檢驗假說 1，我們需要專注於沿時間變異的大國權力對比，追蹤崛起國對單一小國的政策以及對全部小國的政策基調，看是否隨著權力對比的消長而起伏。[13] 爲了檢驗假說 2，我們使用最相似案例設計，選擇在諸多可控制因素上特徵相似而僅在與中華王朝文化親和度上不同的一組小國。一旦固定時間，在同一種權力對比下觀察崛起國對不同小國的政策，便可發現文化親和度的作用——若崛起國在大多數時候對這組小國政策不同，且方向符合預期，便能證實假說 2；若崛起國在大多數時候對這組小國政策相同，則文化親和度作用微弱，令我們拒絕假說 2。[14]

在突厥－隋唐權力轉移時期，西域綠洲是頻繁參與東亞體系互動的小國。「西域」狹義上指玉門關、陽關以西，蔥嶺以東，即今天的新疆地區。隋唐時期，塔里木盆地的主要綠洲國家是龜茲、焉耆、于闐、疏勒這些「漢時舊國」，它們全都國小民寡：焉耆「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龜茲「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于闐「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疏勒「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

---

13 爲了避免偏誤，考察政策基調時須包括吐谷渾、高句麗等本文未覆蓋的小國情況。

14 傳統「差異法」（method of difference）或最相似系統設計（most similar systems design）針對多方面特徵相同而僅有一項特徵不同的情況，期能通過不同的結果證明該項差異的效力。而「多處相同、一處不同、結果相同」的情況可以用布林最小化（Boolean minimization）理解：如果兩個布林表達式僅在一個因果條件不同，但產生了相同的結果，則這一不同的因果條件可被視爲無效，應剔除以簡化表達式（Rihoux & Ragin, 2008: 35）。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魏徵、令狐德棻，1973：1851-1853）。這些城邦的人民以地中海東支印歐人爲主，龜茲、焉耆通行吐火羅語（Tocharian），于闐地區則通行塞語（Sakan），都屬於印歐語系（余太山，2003：34-39、216-218、227），不同於漢藏語系的漢語和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由於地處歐亞大陸的中心，塔里木諸國受到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臘羅馬文明以及草原文明的複雜影響，形成獨特的「十字路口文化」（余太山，2003：214）。吐魯番盆地的高昌本是車師故國，西漢設戊己校尉屯戍後，漢人大規模進駐該地，至 6 世紀初建立了麴氏高昌政權，「國有二十一城」，「勝兵且萬人」（劉昫，1975：5293）。高昌人主體是中原移民，通行漢語，制度脫胎於漢晉，生活習俗漸染胡風（王欣，2013）。公元 1 世紀至 4 世紀，佛教由西向東，傳遍西域。塔里木盆地南緣的鄯善、于闐信奉大乘佛教；北緣的焉耆、龜茲、疏勒信奉小乘佛教（余太山，2003：219-226、228-252）。麴氏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貞觀初年玄奘西行時，發現高昌三萬七千人口中有僧徒數千（余太山，2003：254-260）。突厥建國之初，室點密可汗平定西域，將敦煌以西、波斯以東納入統治。在西域東南部，兩漢時的鄯善與且末兩國已亡，其地在 6 世紀初爲吐谷渾所控制。7 世紀初來往亞歐大陸東西的商旅、使團主要途徑北中南三條路線：在蔥嶺以東，由東向西，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至西突厥汗庭；中道沿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南道則經過鄯善、于闐、朱俱波和喝槃陀（魏徵、令狐德棻，1973：1579-1580）。[15] 西突厥的伊吾與吐谷渾的鄯善在高昌以東、敦煌以西相接，阻遏中原與西域的交通。[16] 西突厥與吐谷渾都向從事東西方貿易的商旅徵稅並提供保護（吳玉貴，1998：103-105）。西突厥對綠洲小國的間接統治因其內部治亂而時松時緊，卻貫穿權力轉移週期的始終，綠洲小國保持各自政權組織、經濟生活及風俗習慣，但國王普遍接受西突厥官號

---

15 6 世紀中葉突厥滅柔然後據有伊吾，東西突厥分立後，伊吾爲西突厥所屬，西突厥設吐屯設統治（劉昫，1975：5179）。鐵勒，亦作敕勒，高車，一說爲丁零後裔，一說爲匈奴後裔。南北朝後期，鐵勒四十餘部廣泛分佈於北亞草原，突厥興盛後統治鐵勒諸部，突厥分裂後，鐵勒分屬東、西突厥。其中金山西南的薛延陀部最強（史爲樂，2005：2131；中國歷史大辭典編纂委員會，2000：2458）。

16 伊吾、鄯善、敦煌、高昌的相對位置參見譚其驤（1982：9-10）。

臺灣人口變遷與社會發展資料庫

並與西突厥聯姻，其中每一代高昌王都結姻突厥（吳玉貴，1998：38-78）。

總體上，西域綠洲國家權力弱小，處於西突厥治下而與隋唐阻隔，一直屬於西突厥陣營；它們僅在文化特徵方面呈現差別：塔里木城邦的文化與中華、草原均不相同，高昌則與中華王朝同文同種（見表 2）。這樣一來，若假說 1 爲眞，則隋唐對西域綠洲的態度將隨著與突厥的權力對比變動；若假說 2 爲眞，則在同一種權力對比的時段內，隋唐會對高昌更和緩，對塔里木城邦更強硬。

表 2　塔里木城邦與高昌的最相似案例設計

	相似（控制）因素			相異因素
	小國與霸權國關係	小國權力	地緣位置	小國文化
塔里木城邦	長期屬於西突厥陣營	弱小國家	西突厥治下，與隋唐阻隔	與中華、草原皆不同
高　昌				近中華文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肆、權力轉移下隋唐對西域綠洲的政策

6 世紀中葉至 7 世紀中葉，突厥兩度居於東亞霸位，又先後被隋、唐兩個崛起國超越。崛起國隋唐對東亞體系內小國的政策在它們與霸權國突厥－東突厥互動的背景下展開。[17]

一、楊隋崛起至突厥衰落（581～6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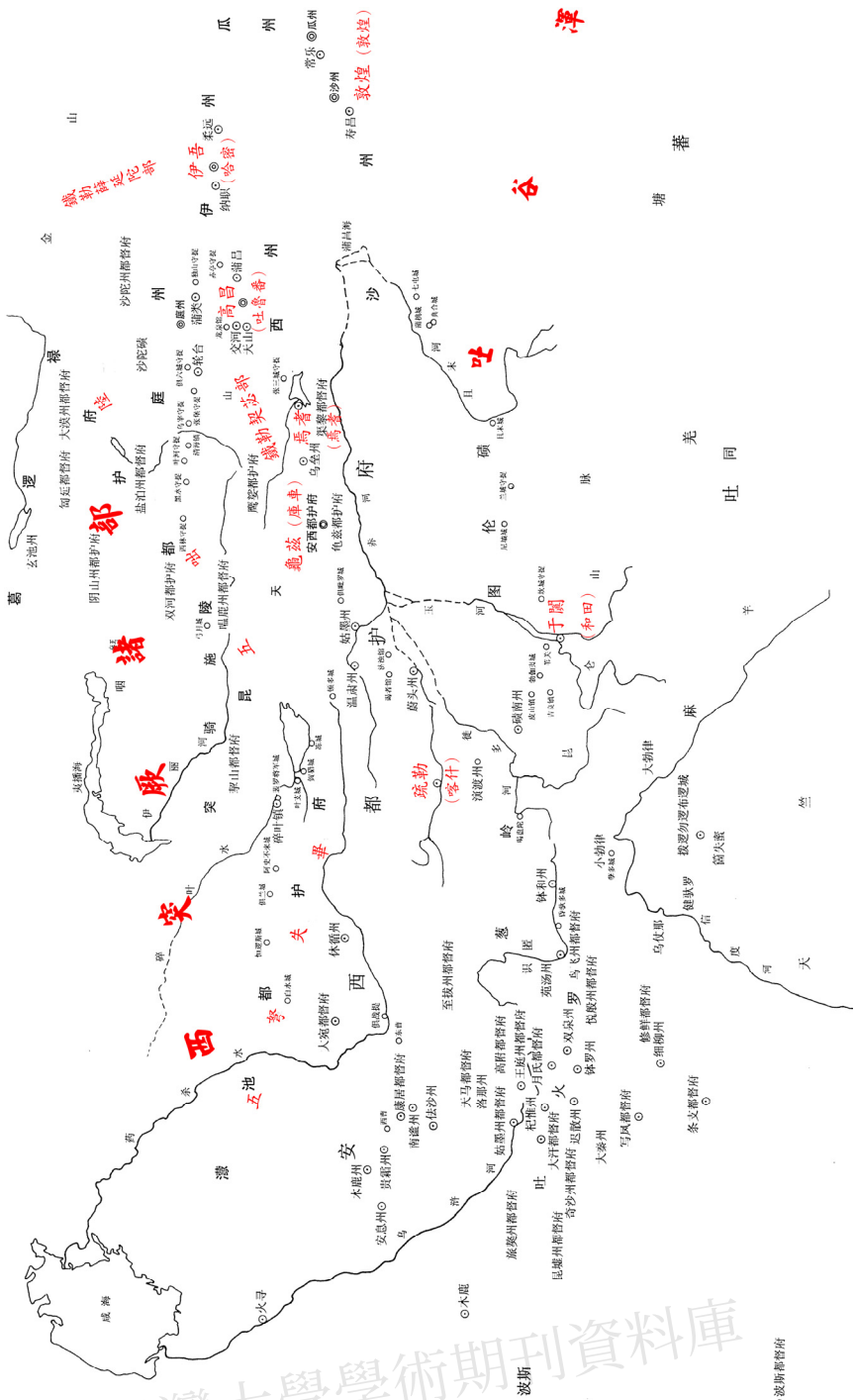
581 至 604 年，突厥分裂衰落，楊隋崛起，統一南北，東亞體系結構由突厥單極轉變爲兩極，很快邁向隋朝新單極的邊緣。

6 世紀中葉，突厥人崛起於金山之陽，從柔然的「鍛奴」一躍成爲東亞體系的霸主。木杆可汗征服了蒙古草原東部的契骨、契丹及奚部落；莫賀咄葉護（即後來的室點密可汗）平定西域諸國，滅嚈噠，占據了波斯以東的廣大地區。突厥汗國建庭于都斤山，「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

[17] 爲了簡明地敘述史事，本文使用公元紀年，不附註年號，但月份和日期與史籍一致爲農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3　突厥－隋唐時期的西域



資料來源：原圖為余太山（2003：附圖「唐代西域」），作者據譚其驤（1982：30-31）標記，括弧內是今地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令狐德棻，1971：909）。在突厥數十萬騎壓迫下，北周、北齊爭相與之結好。北周滅北齊（577 年）開啓了中原王朝的崛起進程，突厥對北周從親善謀利轉爲打擊削弱，更於 582 年發動對隋朝的預防性戰爭。與此同時，突厥因汗位紛爭、部落反叛、連年天災，權力日趨削弱。至 583 年，隋朝挫敗突厥進攻，並反擊獲勝，突厥分裂爲東西兩個獨立的行爲體。[18] 584 年，沙鉢略可汗南下附隋，兩強之間的權力對比由突厥強隋弱轉變爲均勢隋朝略強。[19] 緩解突厥的威脅後，隋朝致力於統一南北，於 589 年初攻破建康，隨後再度北向，推動突厥分崩，至 604 年終於佔據絕對權力優勢。這 23 年間，隋朝與西域綠洲諸國從未接觸。分析隋朝與突厥內部各支勢力的互動脈絡，不難發現，突厥的威脅是干擾隋朝與西域綠洲發展關係的最主要緣由。

由於木杆可汗與莫賀咄葉護同時向東西拓土，突厥在建國之初便埋下了分裂的種子。隋朝建國當年（581 年），佗鉢可汗病故，突厥上層的矛盾在汗位繼承紛爭中日益彰顯。金山東側的小可汗阿波擁兵十萬騎，反對大可汗沙鉢略、第二可汗庵羅和突利可汗處羅侯組成的東部集團。繼承室點密遺業的達頭可汗遂與阿波、貪汗可汗、紇支可汗聯合，組成西部集團。隋臣長孫晟注意到突厥汗國內部的重重矛盾，提出「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的戰略——利用大、小可汗之間以及突厥與其治下族群部落間的各種矛盾，逐一分化瓦解，以削弱突厥。隋文帝立即遣使經伊吾道聯絡達頭可汗，約定互不攻擊，使達頭可汗在 582 年沙鉢略的南侵中拒絕配合。長孫晟繼而

---

18 關於西突厥成爲獨立行爲體的時間點尚存爭論，本文採用 583 年底，相關爭論見馬長壽（2006：28-29）；吳玉貴（1998：26-32）；薛宗正（2008：69）。

19 史料沒有記載突厥各部人口與各首領統率的兵力，581 年五位可汗的 40 萬大軍與隋滅陳時的 51.8 萬人姑可作爲兩國總兵力，突厥軍盡爲騎兵（溫大雅，1983：9），隋軍以步兵爲主（張文才，1998：32-34），由此判斷隋朝建國時權力對比是突厥強隋弱。581 隋朝成功抵禦突厥入侵可視爲權力轉移進入均勢的標志，但仍是突厥略強。隋朝 583 年反擊勝利可視爲度過超越節點的標志，眞正重挫突厥的是 583 年底汗國分裂。此後，權力對比迅速向隋朝傾斜，也反映於 584 至 585 年沙鉢略從使用平等稱呼到附隋稱臣的互動姿態（魏徵、令狐德棻，1973：1868-1870）。但隋朝無法憑藉名義「君臣」關係對突厥施加任何程度的控制，權力對比仍在均勢區間而隋朝略強。隋朝滅陳，才進入隋強東突厥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又於 583 年第一次反擊時勸誘阿波可汗「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魏徵、令狐德棻，1973：1331），促使他與隋朝訂盟。這番操作加劇了突厥的內部矛盾，達頭、阿波、貪汗，以及與沙鉢略不睦的從弟地勒察遂聯合兵力與東部突厥決裂，形成西突厥汗國——「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魏徵、令狐德棻，1973：1876）。爲了繼續孤立、削弱沙鉢略，隋文帝再次通使阿波，拉攏新分立的西突厥。

隨著東突厥的衰弱與西突厥的成長，隋朝逐漸調整策略。584 年，處境日益艱困的東突厥大可汗沙鉢略派遣使臣向隋朝告急，請求率部度過漠南，寄居白道川。隋朝這次轉而支持沙鉢略，出兵接應，供應衣食，並在 8 月確認了與東突厥的君臣名分。587 年初，沙鉢略之弟處羅侯繼任，隋朝冊拜他爲莫何可汗。莫何可汗向西進攻、生擒阿波後，隋文帝又對阿波「存養以示寬大」（魏徵、令狐德棻，1973：1871），實際上是坐視突厥兄弟自相殘殺，減輕邊防壓力，爲統一南北爭取時間。

平陳之後，對突厥權力優勢日趨明顯的隋朝更加主動地操作「離強合弱」。隋文帝先慫恿東突厥大可汗都藍殺死對隋朝不順服的北周千金公主，繼而以安義公主嫁小可汗突利，勸誘他南遷于都斤山，爲隋朝刺探都藍的情報。599 年 2 月，隋朝發動第二次北伐突厥的戰爭，挫敗都藍與西突厥達頭可汗的聯合進攻，挾持突利入朝，冊封突利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安置在河套內側，建立起傀儡政權。

正值隋朝宣佈第三次北伐的 599 年底，都藍可汗遇刺，東突厥陷入內亂，達頭乘勢東進漠北，自立爲步迦可汗。爲了阻止達頭重建統一的突厥汗國，隋軍在啓民的協助下接連進攻，更誘使鐵勒、思結、伏利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落南降。達頭西奔吐谷渾，不知所終。至此，東突厥大可汗都藍與室點密系西突厥大可汗達頭相繼罹難，阿波系西突厥泥利可汗也在 604 年前後遭遇鐵勒反叛而死。一時間，漠北與西域都缺乏足以抗衡隋朝的突厥力量，「盡有步迦之衆」的啓民可汗成爲東突厥唯一「大可汗」，安居黃河南岸，「歲遣朝貢」（魏徵、令狐德棻，1973：1872）。

通過梳理大國關係，可以發現，隋朝之所以能在較短時間內反擊突厥取勝，與突厥內部的分裂密切相關。然而在 604 年以前，隋朝的權力優勢尚未鞏固，隨著突厥內部各派勢力此消彼長，隋朝必須時時謹愼地操作「遠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交近攻，離強合弱」，防止任何一方坐大而構成威脅。在此背景下，隋朝無心過多地關注小國，尤其與西域綠洲的任何接觸都可能波及西突厥，影響對突厥戰略的大局。另一方面，西突厥和吐谷渾阻隔在敦煌以西，通過控制絲路貿易謀利，也不允許綠洲小國自主地與中原往來。

總而言之，從 581 至 604 年，霸權國突厥與崛起國隋朝之間的權力轉移持續發展。隋朝通過「遠交近攻，離強合弱」加劇突厥分崩，將權力對比牽引至均勢，繼而專力準備滅陳戰爭，加強對突厥的優勢。爲了徹底消弭突厥的威脅，隋朝對統治西域的室點密系、阿波系及其後的西突厥汗國時而拉攏，時而打壓。綜合吐谷渾與高句麗的情況，隋朝對小國的政策基調由和緩漸趨強硬，但始終未與西突厥治下的西域綠洲接觸。

二、隋煬帝的霸權工程（604～618 年）

604 至 618 年，東突厥復興、隋朝盛極驟亡，體系結構從隋朝單極的邊緣回歸東突厥單極。本文以 615 年的雁門之圍作爲權力對比的轉折標志，此前隋強東突厥弱，此後則是東突厥強隋弱。[20]

煬帝即位之初，隋朝國力臻於鼎盛，體系結構幾近單極，[21] 但在多數中小行爲體尚未被納入崛起國主導的秩序時，還稱不上霸權更迭。隋煬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魏徵、令狐德棻，1973：94）。607 年，他通過北巡「撫慰」、震懾東突厥（啓民部），隨後展開塑造新霸業的政治軍事工程。

---

[20] 隨著東突厥啓民部的休養復甦和隋朝過度消耗權力資源，權力轉移趨勢逆返。615 年，始畢可汗趁隋煬帝北巡，率數十萬騎將煬帝圍困在雁門，長達 32 天，煬帝聯繫東突厥可敦義成公主謊報軍情，才迫使始畢解圍。此後東突厥聲勢大增，重登霸位，隋朝內亂不息，走向衰亡。雁門之圍是體系結構從隋朝準單極返回東突厥單極過程中隋朝與東突厥的唯一交手，故作爲權力對比逆返的標誌。

[21] 大業年間隋朝常備兵力約六、七十萬（張文才，1998：68-78）。607 年隋煬帝北巡隨扈軍士多達 50 萬；612 年第一次用兵高句麗出動了 113 萬人，但戰馬只有十萬匹（魏徵、令狐德棻，1973：687-688），可見騎兵比例較低。北周禪位時，隋朝人口約 559 萬户 1,291 萬口，滅陳後增加至約 750 萬户，至開皇末又增長到約 870 萬户。到 609 年，著籍户口爲 907 萬户 4,600 餘萬口（凍國棟，2002：130-131、519-520）。開皇年間，隋朝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至開皇末年，「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逾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魏徵、令狐德棻，1973：673）。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隋煬帝派吏部侍郎裴矩至張掖掌管與胡商的互市。裴矩留心瞭解西域的風土民情、山川險易，編成《西域圖記》獻給煬帝，稱隋朝「國家威德，將士驍雄」，西域小國「引領翹首，願爲臣妾」，正值「混一戎夏」的大好時機，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諸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建議「滅渾厥」，開闢西域。裴矩迎合了煬帝的需要，煬帝「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魏徵、令狐德棻，1973：1579-1580）。

605 年，西突厥鐵勒契苾部契苾哥楞自立爲易勿眞莫何可汗，薛延陀部乙失畢自立爲也咥小可汗，二人聯合擊潰泥撅處羅可汗。西突厥的內亂爲隋朝製造了機遇。608 年初，隋煬帝一邊派裴矩前往「撫慰」莫何，要求他出擊吐谷渾以示效忠，另一邊遣崔君肅誘迫處羅降隋，同樣鼓動他進攻吐谷渾獻誠。處羅正受鐵勒所困，只有莫何出兵東進，擊敗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不明就裡，率部接近隋境求援，隋軍趁機又大破其眾。

重挫吐谷渾後，隋朝進兵絲路北道的門戶伊吾。混戰中的西突厥與鐵勒無暇顧及這塊邊緣領地。608 年冬，隋將薛世雄孤軍突襲伊吾，西突厥吐屯設請降。薛世雄在漢故伊吾城東另築新城，號「新伊吾」，留兵一千戍守。隨軍的裴矩對前來質疑的西域諸國使節解釋：「天子爲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耳。」西域各國「咸以爲然，不復來竟」（魏徵、令狐德棻，1973：1581）。由此，隋朝初步奠定經營西域北道的基礎。

隋軍撤退後，伏允收復故地。隋煬帝於 609 年 4 月率百官、后妃及大軍西巡，親征吐谷渾。6 月初，隋軍從伊吾道進兵，沿東、南兩方向迅速平定吐谷渾全境。隋煬帝將吐谷渾故地納入版圖，設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打開了西域的東南門戶。在隋軍掃蕩吐谷渾之時，隋煬帝抵達張掖。此前裴矩已厚利引誘「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使節）」到張掖迎駕。受到隋朝平定吐谷渾的震懾，伊吾吐屯設再「獻西域數千里之地」（魏徵、令狐德棻，1973：1580）。隋朝遂於次年設立伊吾郡，鞏固了北道東端的橋頭堡。

與平定吐谷渾同時，隋煬帝不忘利用西突厥內亂進一步削弱其勢力。609 年，西突厥小可汗射匱遣使請婚，隋煬帝提出「發兵誅處羅」的條件。射匱遂於 611 年擊潰泥撅處羅可汗，裴矩偕處羅之母漢人向氏脅迫處羅入朝降隋。至此，西突厥由阿波系治下重歸室點密系。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射匱可汗忙於征剿鐵勒，無力控制綠洲小國；而隋朝的擴張極大地震撼了西域，使得「諸蕃懾懼，朝貢相續」。數年間朝貢者除了焉耆、龜茲、疏勒、于闐等塔里木城邦，還有蔥嶺以西的許多國家。隋朝通過展示富強吸引它們，多次安排隆重盛大的活動，每每「焚香奏樂，歌儛喧噪」，「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塡咽」，還要求洛陽店鋪無償邀請來往胡商「醉飽而散」。「蠻夷嗟嘆，謂中國爲神仙」（魏徵、令狐德棻，1973：1580-1581）。

在綠洲諸國中，高昌是絲路中道的東部門戶，一向與西突厥關係緊密。然而，當東亞體系即將邁入新單極時，高昌率先轉變態度，於 608 年首次遣使朝貢。在隋軍駐扎伊吾、向吐谷渾進兵的 609 年 6 月，高昌王麴伯雅親赴張掖謁見，煬帝封他爲「左光祿大夫、車師太守、弁國公」，將戚屬宇文玉波封爲華容公主嫁之。不過，沒有證據表明隋煬帝試圖加強控制、將高昌作爲滲透西域的據點。

隋朝主要通過駐兵伊吾與河源四郡向西域施壓。爲了「捍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隋煬帝「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魏徵、令狐德棻，1973：687）。雖然隋軍沒有兵臨西域諸國，前述行爲仍可視爲脅迫。《隋書・西域傳》總括說：「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魏徵、令狐德棻，1973：1841）。」這是隋代文獻惟一一次提及「西域校尉」。作爲武官，其職責應與前代戊己校尉、西域校尉、西戎校尉等類似，都是鎮戍西域。儘管無從得知更多信息，我們仍可由這一細節推想，煬帝的雄心不限於溝通貿易，隋朝擴張的目標也絕不止於西域東緣。

帝國過度擴張往往是衰敗的源頭，煬帝即位以來，興建東都、開鑿運河、北巡突厥、西征吐谷渾，已經消耗了大量權力資源，但他不曾察覺盛極而衰的徵兆。610 至 614 年，隋煬帝又開展全國動員，三征高句麗，卻屢屢不勝而還。繁重的勞役、兵役導致百姓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群盜」（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1956：5655）。

總結隋朝的霸權工程，恰如《隋書》所描繪：正是由於即位之初，「國家殷富」，才滋長了煬帝「肆情方騁」的志向，將「大業」由國內推展到東亞體系。在新單極的曙光中，隋朝開展霸權工程的第一步便是消除吐谷渾與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西突厥阻遏西域的勢力，並通過興建軍事據點、展示富強等手段，兼施脅迫利誘，試圖循序漸進地控制西域，只是「以遼東之役，故未逞也」（魏徵、令狐德棻，1973：1879）。隋煬帝「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故而「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魏徵、令狐德棻，1973：95），鮮明地印證了崛起國取得絕對權力優勢後全面顛覆體系的行爲傾向。綜合西域、吐谷渾、高句麗的情況，隋朝對小國的政策基調非常強硬。在霸權工程中，隋朝人民「雖復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橫徵暴斂與窮兵黷武激化了社會矛盾，導致「僭僞交侵，盜賊充斥」、「人相啖食，十而四五」、「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魏徵、令狐德棻，1973：672-673），將隋煬帝與他的帝國送上不歸路。

三、李唐崛起至東突厥滅亡（618～630 年）

618 至 630 年，李唐從割據政權中迅速崛起，進而滅亡東突厥，體系結構由東突厥舊單極演變爲兩極，很快滑向李唐新單極。本文以 626 年渭水之盟作爲權力對比轉折的標志，此前東突厥強唐弱，此後唐強東突厥弱。[22]

風雨飄搖的隋帝國無法顧及擴張成果，南逃黨項的伏允收復故地，射匱可汗治下的西域綠洲國家斷絕朝貢。東突厥再度登上東亞體系的霸權之巔：「值天下大亂，中國人奔之者眾。其族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劉昫，1975：5153）。中原割據政權紛紛向東突厥稱臣，試圖借重其勢，其中也包括李唐。東突厥同時扶植多支割據政權，積極向南滲透。隨著唐朝成長爲新崛起國，東突厥連年南侵，試圖遏止李唐崛起，規模皆達數十萬騎，唐朝疲於應付。渭水之盟前，唐朝對東突厥由恭順轉變爲守勢，仍持續輸款納幣，避免直接大規模戰爭。

隋唐交替之際，西突厥國勢日隆。614 年左右，射匱可汗征服鐵勒的契

---

[22] 626 年，頡利可汗南侵，兵馬號稱二百萬（實際應有數十萬），攻至涇陽，唐太宗引兵赴渭水，責備頡利負約，又展示軍容，傳達必戰決心，頡利可汗既愧且懼，與唐太宗斬白馬盟誓，撤兵回國。太宗與頡利可汗在渭水便橋上的密談沒有留下記錄，但太宗回宮後自陳欲取先予的道理，說明很可能繼續「陷以玉帛」，換取突厥退兵（劉昫，1975：5158；吳玉貴，1998：201-202）。唐太宗也發現「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劉昫，1975：5158），足見東突厥統治階層的分裂已經表面化。因此我們將渭水之盟作爲轉折標志。

臺灣人口數位典藏

苾－薛延陀汗國，恢復對西域東部的控制，「東至金山，西至海（今里海），自玉門已西諸國皆役屬之」（劉昫，1975：5181）。統葉護可汗繼位（618 年）後，又征服了鐵門關以南、罽賓以北、波斯以東、蔥嶺以西的廣大地區。在統葉護可汗治下，西突厥「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並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劉昫，1975：5181）。」

草創的李唐王朝面對東突厥的巨大壓力，試圖復製「遠交近攻，離強合弱」。620 年，統葉護可汗遣使至唐，「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並力以圖北蕃」（劉昫，1975：5181）。統葉護承諾 622 年冬出兵，大軍將發時，頡利可汗匆忙與統葉護通和，約定互不侵犯。統葉護可汗未能出兵，卻又在 625 年 4 月向唐請婚。唐高祖認爲西突厥的戰略價值下降，「急疾不相得力」，然而朝臣主張「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勸高祖「待之數年後，中國盛全，徐思其宜」（劉昫，1975：5181）。唐高祖才派其侄高平王李道立再度前往西突厥報聘。這證明，權力劣勢的唐朝以緩解東突厥威脅作爲對外關係的首要考量，即使與西突厥聯合出兵已不可能，依然試圖利用它牽制東突厥。時值頡利可汗常年入侵，西北交通困難，李道立直至 627 年底才在眞珠統俟斤的陪同下返回長安，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作爲聘禮。這自然又引起頡利可汗的警惕，他一面騷擾唐朝邊境，一面警告統葉護「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劉昫，1975：5182）。統葉護可汗「患之」，方在躊躇間，被伯父莫賀咄刺殺。西突厥又一次內亂，唐朝與西突厥結盟的計劃遂告破產。

與開皇年間的隋朝相似，武德年間的唐朝積極聯絡西突厥，對西突厥治下綠洲小國的態度卻相當消極。619 年，高昌王麴伯雅逝世，繼位的麴文泰向唐朝告哀，唐高祖遣使弔喪。此後，高昌連續貢獻拂菻狗、玄狐裘、玉盤，「西域諸國所有動靜，輒奏以聞」（劉昫，1975：5294）。然而，唐高祖沒有積極回應，史料亦未記載唐朝曾是否利用高昌提供的信息對西域採取任何行動。唐高祖即位之初，龜茲王蘇伐勃駃曾遣使入朝，史料也沒有記載唐朝方面的回應。不久，勃駃逝世，「蘇伐疊代立，號時健莫賀俟利發」（劉昫，1975：5303），依舊接受西突厥的官爵，唐朝未加過問。

東突厥的內部矛盾從未消弭，以致重蹈覆轍，在頡利可汗治下衰相盡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顯。統葉護可汗遇刺後，乙失畢之孫夷男率領薛延陀七萬落翻越金山，聯合漠北鐵勒諸部，反叛東突厥，至 628 年建立薛延陀汗國。東突厥的衰弱令唐朝君臣開始籌劃反攻。唐太宗先果斷消滅東突厥庇護的梁師都，又冊封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628 年），繼而承認薛延陀對漠北的統治（629 年），連續接納東突厥貴族與治下部族降唐，最終於 630 年初輕易捕獲逃遁漠南的頡利可汗，一舉滅亡東突厥汗國。東突厥的瓦解驟然將國力遠未充沛的唐朝推上東亞體系的霸位。

基於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唐朝草創之初，權力遠比隋朝建國時弱小，通過臣事霸權國東突厥獲取支持、實現生存、謀求統一。唐朝的迅速崛起招致東突厥的預防性戰爭，爲了應對東突厥威脅，唐朝曾兩次試圖與西突厥結盟，皆因東突厥阻撓而作罷。在此背景下，武德至貞觀初年的唐朝對小國的政策基調極爲和緩。對於西突厥治下的西域綠洲，唐朝態度消極，僅因高昌主動示好而與之保持聯繫（可視爲羈縻），在塔里木諸國中，也僅接觸過主動朝貢的龜茲。

四、唐朝的霸權工程與吐蕃崛起（630～670 年）

630 至 670 年，唐朝由弱勢單極繼續崛起，成長爲眞正的體系超強；吐蕃的崛起則再度將東亞牽入兩極。

東突厥既滅，東亞進入李唐獨強的單極時代。主要對手的消失移除了唐朝繼續崛起的障礙，即使經濟基礎尚未恢復，唐朝仍通過軍事建設實現權力躍升，[23] 爲開展霸權工程提供了必要條件。

射匱可汗時期，伊吾重歸西突厥所屬。東突厥滅亡之初，唐太宗有意從伊吾道開闢西域，命涼州都督李大亮在伊吾以東存糧賑濟流散的西突厥種落。李大亮勸諫：「……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獲；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1956：

[23] 639 年，唐朝全國十道著籍人口 304 萬户、1,235 萬口；652 年，全國户數仍在 380 萬左右（凍國棟，2002：135-139）。攻克長安後，李淵的兵力已達 20 餘萬。唐朝重視騎兵建設，騎兵占戰鬥兵員的 30% 左右（楊希義、于汝波，1998：149-153）。636 年，唐太宗整頓府兵；639 年，唐全國府兵增加至 65 萬左右（楊希義，于汝波，1998：126-140；古怡青，2002：5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6081-6082）。」唐太宗方作罷。唐朝放棄招慰，伊吾城主（可能是吐屯設）卻於 630 年 9 月至長安朝見，率所屬七城降唐。唐太宗毫不費力地取得伊吾，設置羈縻西伊州。

彼時西突厥國內日益混亂。碎葉川以西的弩失畢五部推舉統葉護之侄阿史那泥孰爲汗。泥孰不肯就位，迎立統葉護之子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碎葉川以東受咄陸五部支持的莫賀咄相互攻伐。莫賀咄、肆葉護都遣使請婚，希望獲得唐朝的支持。唐太宗以「汝國擾亂，君臣未定，戰爭不息，何得言婚」拒絕，敷衍地「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劉昫，1975：5182）。

西突厥連年內戰，國勢大衰。630 年 12 月，高昌王麴文泰入朝，綠洲各國紛紛組織使團，希望隨他進貢。唐太宗本欲迎接，遭到魏徵勸諫：「中國始平，瘡痍未復……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爲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劉昫，1975：254）」太宗於是放棄招徠。根據李大亮與魏徵的主張可知，新霸權唐朝的社會經濟基礎薄弱，故而錙銖計較對外關係中的成本收益。在此背景下，唐朝只是友善回應西域綠洲的主動親附，卻未進一步拉攏。如麴文泰之妻宇文玉波請求加入宗室，唐太宗賜李姓，封常樂公主。龜茲王蘇伐疊遣使獻馬（630 年），「太宗賜以璽書，撫慰甚厚」。但對於龜茲「由此歲貢不絕，然臣於西突厥（劉昫，1975：5303）」的避險行爲，唐太宗不曾過問。

唐朝避免虛擲國力，不等於無意控制西域，西突厥內戰情勢逐漸明朗則爲唐朝提供了契機。630 年底，泥孰擒殺莫賀咄，與肆葉護可汗逐漸不和。632 年 7 月，肆葉護擔憂泥孰謀叛，欲暗中翦除；泥孰反擊，肆葉護逃奔康國，不久離世，各部遂迎立泥孰。武德年間，泥孰曾作爲西突厥使臣到長安，與秦王李世民結爲兄弟。或許是希望借助唐朝的支持鞏固政權，泥孰立即遣使表示內附。西突厥出現親唐政權顯然有利於唐朝影響西域，唐太宗冊立泥孰爲吞阿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632 年 8 月），這是唐朝首次冊封西突厥可汗。同年，唐朝將西伊州易名伊州，改爲正州。年底，焉耆王突騎支遣使請求重開磧路，唐太宗欣然應允。[24] 這些看似不相關的事件

[24] 北朝以來，西域通中原，可以走高昌、伊吾，然後到敦煌，即伊吾路；可以從焉耆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展示，唐朝逐漸轉變觀望態度，開始向西域滲透。

633 年，泥孰之弟同俄設繼位，唐太宗又冊立他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咥利失上表請婚。唐太宗未許聯姻，卻厚加撫慰，「令與焉耆爲援」（劉昫，1975：5301）。基於這層瓜葛，焉耆與唐朝拉近了關係。同一時期，高昌表面親附，實際並不忠誠。麴文泰擔心重開磧路影響高昌在絲路貿易中的壟斷利益，出兵大肆劫掠焉耆。此後，高昌不僅阻截西域其他國家的貢使、配合西突厥葉護攻打伊吾，還拘留從東突厥逃亡至高昌的漢人（劉昫，1975：5294）。然而，唐朝並未對高昌的挑釁行爲施以任何懲罰。

咥利失可汗在位時，對西突厥各部的控制削弱，被迫承認五咄陸與五弩失畢的自治權，確立「十箭兩廂」制。638 年，反叛咥利失的勢力擁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25] 受唐朝支持的泥孰系在爭奪中連連敗退。638 年底，乙毗咄陸控制的處月、處密部聯合高昌攻佔焉耆五城，焉耆向唐朝控訴。唐太宗向高昌下達最後通牒，麴文泰稱疾拒絕入朝。639 年 12 月，唐太宗終於派侯君集、薛萬均率「突厥、契苾之眾，步騎數萬」討伐高昌（劉昫，1975：5295）。唐軍穿越戈壁，麴文泰驚懼之下一命嗚呼。此前，麴文泰曾與乙毗咄陸可汗「約有急相爲表裡」，乙毗咄陸派一葉護屯駐高昌附近的可汗浮圖城。當唐軍抵達高昌城下，乙毗咄陸「懼而西走」，西突厥葉護也獻城降唐，新王麴智盛只得投降（劉昫，1975：5296）。唐太宗將高昌故地改爲西州，在可汗浮圖城設庭州——都是與內地一樣的正州；又在附近的交河城設置安西都護府，每年調發一千府兵駐守。至此，伊州、西州、庭州和安西都護府在西域東端相互拱衛，成爲唐朝進一步經營西域的基地。

隨著乙毗咄陸的勢力向東發展，焉耆也轉而依附咄陸。644 年 8 月，安西都護郭孝恪以焉耆叛唐爲由請求出兵。唐軍捕斬七千人，生擒突騎支，

南穿越大沙磧（今羅布泊），進入敦煌，即磧路。磧路自然條件惡劣（魏徵、令狐德棻，1973：1847），經隋末戰亂又日漸荒廢，西域與中原往來皆「道由高昌」（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1956：6096）。

25 東突厥始畢可汗之子曾擔任欲谷設，《資治通鑒》先記載欲谷設於 630 年 8 月 26 日降唐（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1956：6082），此後又突然出現「（638 年，西突厥）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1956：6142）。」目前多數文獻將兩處欲谷設作爲同一人。

臺灣人專用 請勿轉載 版權所有

立其弟栗婆準爲王。然而，就在唐朝平滅高昌之後的四五年間，西突厥內戰的情形發生重大轉折：乙毗咄陸雖連續戰勝唐朝冊立的泥孰系可汗，卻因嚴苛待下眾叛親離，逃奔吐火羅（最遲在 643 年）。唐軍撤離焉耆時，泥孰系乙毗射匱的勢力正迅速擴張，其屬下處般啜改立栗婆準的堂兄薛婆阿那支，將栗婆準送往龜茲，栗婆準被龜茲王蘇伐疊所殺（吳玉貴，1998：342-348）。唐朝征討焉耆的戰果，落入了乙毗射匱手中。唐朝雖一直支持泥孰系，卻不會坐視泥孰系壯大侵蝕自己的利益。645 年，唐太宗派阿史那忠至西域「撫慰」，促使處月、焉耆歸服（吳玉貴，1998：348-354）。面對唐朝施壓，乙毗射匱可汗於 646 年 6 月朝貢請婚，希望唐朝承認他對西域的控制，唐太宗要求他割讓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爲聘。這說明，唐朝已經不滿足於通過西突厥親唐政權影響西域，而以直接控制爲目標，並且志在吞併整個塔里木盆地。

唐朝與乙毗射匱聯姻未果，與泥孰系的關係遂告破裂，很快找到了出兵機會。647 年底，龜茲王蘇伐疊離世，其弟訶黎布失畢繼位。唐太宗無視布失畢兩次朝貢，以龜茲曾幫助焉耆對抗唐軍、漸失臣禮、侵掠鄰國爲由，下詔討伐。與討伐吐谷渾、高句麗、高昌等國的詔書不同，唐太宗的〈伐龜茲詔〉完全未出現「龜茲」，反而字字直指西突厥，尤其強調西突厥與東突厥本屬一國，東突厥故地已成唐朝轄境，只餘天山以北的「烏孫舊境，罝罝所漏」。唐太宗將東突厥比作「本」與「皮」，將西突厥視爲「末」和「毛」，質問「本既先拔，末豈能全；皮尚不存，毛將安附？（李世民，1983）」詔書袒露，在新霸權唐朝眼中，西突厥是舊霸權的殘餘勢力，是實現霸業必須消滅的對象。唐朝的權力持續躍升，西突厥內部格局又發生變動，最終促使唐朝放棄扶植泥孰系，發動了掃蕩西域的戰爭。

647 年 12 月，唐太宗詔命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領降唐突厥十萬騎、附唐鐵勒十三部，及沙、伊、西州府兵，同時向龜茲進軍，又令唐朝扶植的吐谷渾以及與唐朝和親不久的吐蕃發兵分道出擊。唐軍擊潰處月、處密部，追斬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另立其從弟先那準；又擊潰龜茲王訶黎布失畢、大臣那利、大將羯獵顛的五萬軍隊（應包括西突厥援軍），招降龜茲七百餘城，俘虜男女數萬人，另立布失畢之弟葉護。阿史那社爾將布失畢、那利押送長安。或許因爲地處塔里木盆地南緣，受西突厥影響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較小，于闐王尉遲屈密曾於 632 年遣使獻玉帶，「太宗優詔答之」；至唐朝出兵高昌的 639 年又遣子入侍（劉昫，1975：5305），由此成爲綠洲諸國中對唐朝最親善者。唐軍伐龜茲，新任于闐王伏闍信主動獻一萬三百匹駱駝饋勞，然而他的恭順未能換取唐軍的友善。攻下龜茲後，阿史那社爾聽從薛萬備建議，派五十騎脅迫伏闍信入唐朝見（劉昫，1975：5305）。

「龜茲」之戰使唐朝加強了對焉耆、龜茲、于闐的控制，也極大地削弱了西突厥的勢力。648 年底，唐太宗任命西突厥降將阿史那賀魯爲沙鉢羅葉護，招討尚未歸降的西突厥部落。賀魯招討頗有成效，唐朝於次年 2 月設立瑤池都督府，以賀魯爲都督，隸屬於安西都護，「統（咄陸）五啜、（弩失畢）五俟斤二十餘部」（劉昫，1975：5197），意在將西突厥納入羈縻府州體制，仍以賀魯實際統轄。649 年 5 月，唐太宗駕崩，賀魯或許認爲有機可乘，於 651 年初吞併乙毗射匱可汗所部，自號沙鉢羅可汗，試圖復興獨立的西突厥。一時間，五咄陸、五弩失畢、處月、處密部以及綠洲諸國全部歸附賀魯，兵力多達數十萬。爲了將唐朝勢力驅逐出西域，賀魯在 651 年 7 月攻擊庭州。唐朝當然不能容忍西突厥死灰復燃，分別於 651 年、656 年、657 年三次發動對賀魯的征剿，最終生擒賀魯。657 年底，唐朝將賀魯之地分割爲六個都督府。

唐軍自龜茲撤退（648 年）後，龜茲發生內亂。650 年 8 月，唐高宗送訶黎布失畢回國安撫。龜茲大將羯獵顛在賀魯的支持下擁兵阻拒，布失畢只得據守泥師城。658 年正月，唐朝終於從賀魯之亂中抽身，再次平定龜茲。5 月，唐朝將安西都護府治所遷到龜茲，升爲安西大都護府，更原府爲西州都督府。這樣，唐朝在西域的統治中心移至塔里木盆地北緣、絲路中道要衝、兩漢西域都護府故地（張安福，2013；薛宗正，2011）。爲了實現有效控制，唐朝在塔里木城邦施行羈縻府州與鎮戍結合的雙重建制：一方面將塔里木城邦改置爲都督府——龜茲爲龜茲都督府，焉耆爲焉耆都督府，于闐爲毗沙都督府，疏勒爲疏勒都督府，仍以國王世襲兼任都督；另一方面，唐軍也在四地鎮戍，四鎮都督受安西大都護府的軍事統領，有責任以本國兵力協防。[26]

[26] 關於此前唐朝與疏勒的關係，史籍僅言「貞觀中，突厥以女妻王……貞觀九年（635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59 年 3 月，唐將阿史那彌射追斬乙毗咄陸之子頡苾達度，滅亡西突厥咄陸系。唐朝將西突厥餘部納入羈縻府州，保留其傳統的政權結構，又在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俱波等國設置 127 個羈縻州，繼而於 661 年在吐火羅、嚩噠、罽賓、波斯等 16 國部分地區設置 8 個都督府 76 個羈縻州。至此，敦煌以西至波斯東緣的西突厥故地及役屬各國全部歸安西大都護府管轄，唐朝的西方疆域達到極盛。

唐朝對西域的統治持續未久，新崛起國吐蕃便於 670 年發起進攻，唐蕃之間對西域的爭奪一直延續到 8 世紀。

總而言之，唐朝的霸權工程雖不如隋朝急迫，卻遠比隋朝成功。在經濟資源不濟的情況下，唐朝通過大興馬政、整頓府兵發展軍事權力，尤其收編舊霸權卓越的騎兵軍團，既極大地提升權力投射能力，也避免了在農耕地區大規模動員激起社會動蕩的險境。從 630 到 640 的十年間，唐朝先觀望西突厥內亂，後來通過名義支持泥孰系維持親唐的西突厥政權；期間接受高昌、焉耆、龜茲、于闐、疏勒入朝，卻並未加強控制（羈縻）。隨著自身權力的持續成長，唐朝的雄心逐漸袒露，以戰爭掃蕩東亞體系，對小國的政策基調十分強硬，在武力滅亡舊霸權殘餘西突厥同時，接連將綠洲諸國納入統治。

伍、比較分析

精細梳理案例，每個時空的具體事件都有千絲萬縷的起因。然而，倘若跳脫事件的具體情境，回到本文探討的焦點——促成政策的條件因素，便不難通過比較分析把握共通規律。

遣使獻名馬，自是朝貢不絕（劉昫，1975：5305）。」本文推測，唐朝應是在征伐西突厥同時將疏勒納入統治。有唐一代，安西四鎮經歷四置三廢（薛宗正，1993），四鎮的總兵力最初不超過兩千，後來在與吐蕃的爭奪中加強駐防，每鎮常駐府兵六千（孟憲實，2012；陳國燦，20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　權力轉移下隋唐對西域綠洲的政策

朝代	編號	子案例	權力假說			文化假說		實際情況		
			大國權力對比	預期攻守傾向	預期政策基調	小國文化	預期政策方向	實際攻守傾向	實際政策	實際政策基調
隋	1	581～584 塔里木城邦	突厥強隋弱→均勢隋略強	守勢→攻勢	和緩→強硬	與中華、草原均不同	強硬	守勢	未接觸	和緩
	2	581～584 高　昌				近中華文化	和緩		未接觸	
	3	584～604 塔里木城邦	均勢隋略強→隋強東突厥弱	攻勢	強硬	與中華、草原均不同	強硬	守勢→攻勢	未接觸	和緩→強硬
	4	584～604 高　昌				近中華文化	和緩		未接觸	
	5	604～618 塔里木城邦	隋強東突厥弱→東突厥獨強	攻勢→守勢	強硬→和緩	與中華、草原均不同	強硬	壓制→守勢	脅迫＋利誘	強硬
	6	604～618 高　昌				近中華文化	和緩		脅迫＋利誘	
唐	7	618～626 塔里木城邦	東突厥獨強→東突厥強唐弱	守勢	和緩	與中華、草原均不同	強硬	守勢	鮮少接觸	和緩
	8	618～626 高　昌				近中華文化	和緩		羈縻	
	9	626～630 塔里木城邦	東突厥強唐弱→均勢唐略強	守勢→攻勢	和緩→強硬	與中華、草原均不同	強硬	守勢→攻勢	羈縻	和緩
	10	626～630 高　昌				近中華文化	和緩		羈縻	
	11	630～659 塔里木城邦	唐朝獨強	攻勢	強硬	與中華、草原均不同	強硬	克制→攻勢	羈縻→征服或脅迫	強硬
	12	630～659 高　昌				近中華文化	和緩		羈縻→征服	

說明：實際政策基調包括吐谷渾與高句麗等本文未覆蓋的子案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一、大國權力對比

彙整所有小國的情況，勾勒隋唐在各種權力對比下對突厥的攻守傾向以及對小國政策的強硬或和緩程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權力轉移週期內，崛起國隋唐對小國的政策基調隨著它們與體系霸權突厥－東突厥權力對比的起伏而改變，處於劣勢時和緩，處於優勢時強硬。其中若干看似與預期不一致的細節並未衝擊理論框架的解釋力，反而加強了權力邏輯。

在均勢階段，霸權國與崛起國的權力對比易於逆轉，即使佔據優勢，優勢方仍必須謹慎應對劣勢方的威脅（無論劣勢方是否採取進攻行爲）。若將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權力對比分爲位置與差距兩個面向，我們可以進一步細化權力優勢：物質資源積累超越對手，可能在數次戰爭中取勝——位置優勢但差距小；在若干重大戰爭中取勝，或對手嚴重衰敗——位置優勢且差距大。在前一種情況下，優勢方爲了鞏固並增強優勢，仍需將大部分資源投入競逐，避免同時在多項關係中消耗權力，故而可能對部分小國間或強硬，但總體基調仍在和緩區間。581 至 604 年，隋朝雖反擊突厥取勝，尚存江南之患，突厥雖分裂，尚有相當實力，以故隋文帝先集中大部分權力滅亡陳朝（589 年），此後試圖征服高句麗，受東突厥干擾而回兵北伐（598 年）。626 至 630 年，唐太宗在渭水之畔覷破頡利可汗的外強中乾，但東突厥還未遭遇薛延陀的沉重打擊，以故唐太宗通過消滅梁師都、拉攏薛延陀、誘降東突厥貴族與治下各部，進一步擠壓、削弱東突厥。經過數次較量，崛起國取得決定性勝利，確認絕對權力優勢，對小國的政策便會迅速而全面地趨於強硬——隋煬帝、唐太宗的霸權工程。唐朝的霸權工程推進緩慢，是因爲東突厥的滅亡主要由自身衰落所致，新霸權唐朝的權力不足，還面對舊霸權殘餘西突厥。唐朝記取隋朝亡國教訓，致力於保持崛起，耗時 30 餘年，最終實現霸權更迭。

只要霸權國一息尚存，仍有捲土重來的可能。雁門之圍前，隋朝權力的衰落沒有牽動政策收縮，可以通過隋煬帝的誤判理解。政策產生需要經過決策者認知的環節，而決策者不是全知者（omniscience），尤其在技術條件落後的前現代，「知己知彼」絕非易事。隋煬帝對大國權力對比的認知停留在 607 年北巡時啓民可汗跪伏上壽的經驗（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1956：5634），他自信於鼎盛國力，持續循著大業初年的方式擴張，其行爲不符合研究者的預期，卻符合決策者的認知，仍可視爲理性行動。遭遇雁門之圍後，隋煬帝從開疆辟土轉而避禍江東，說明他已經發現權力形勢的改變。而三征高句麗的失敗也體現了權力的決定性作用——結構的力量會懲罰誤判者並矯正其行爲。[27]

---

[27] 本文理論框架體系層次與單元層次多重作用的設計與新古典現實主義有共通之處，但理論取向和研究範圍與之不同。新古典現實主義試圖釐清各種中介變項如何作用於國家政策的認知、決策、執行等環節（Ripsman et al., 2016）；而本文主要關心促成政策的外部條件，無意打開國家內部甚至決策者個人心理的黑箱，核心因果鏈繞過了政策的產出過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整體而言，崛起國對小國政策基調確實隨著與霸權國權力對比的波動而變化，若加入「已確認絕對優勢」這項細節條件，並考慮誤判下的理性行爲，則假說 1 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成立。

二、小國與崛起國文化親和度

西域綠洲的權力、地緣位置及與突厥的關係都相同，其中高昌是唯一以漢人移民爲主體的國家。依照假說 2 的預期，高昌應該得到比塔里木城邦更和緩的待遇。但事實證明，隋唐對高昌的政策與對塔里木城邦的態度相同。其間的細微差別在於，618 至 630 年，唐朝與高昌保持友好交往，卻鮮少接觸其他西域小國——這似乎符合假說 2 的預期。然而，據史料可知，當時唐朝與高昌的友善關係是出於高昌主動親附而非唐朝的決策，即使高昌甘願充當耳目，唐朝也並未利用它提供的信息採取任何行動。同樣，對當時唯一主動遣使入朝的塔里木國家龜茲，唐高祖亦無積極回應。

630 年後，隨著乙毗咄陸系在西突厥內亂中占據上風，高昌日漸有恃無恐，攻擊伊吾，拘留流散漢人，還慫恿薛延陀與唐朝抗禮，然而仍在休養階段的唐朝一直無視高昌的挑釁言行。足見，在權力資源充沛之前，唐朝均未主動地親善或懲罰高昌。直至唐朝以武力涉入西域、消滅舊霸權殘餘，高昌方成爲第一個被滅亡的綠洲政權，與塔里木城邦同樣遭到兼併。在兼併西域綠洲的過程中，唐朝對高昌、焉耆、龜茲直接出兵征服，對于闐則使用脅迫，這微小的差異絕非文化所導致。唐朝將高昌納入正州，卻在塔里木城邦設置羈縻府州，但如果考慮同樣成爲正州的伊吾，本文也不認爲此差別是文化所致，而可能是受地緣因素影響。如此一來，沒有證據顯示，隋唐在任何權力對比情況下對文化親近的小國比對文化疏遠的小國更和緩，令我們拒絕假說 2。

陸、結論

身處權力轉移的時代關口，崛起國如何對待小國兼具理論與實務的重要性。本研究不預設立場，讓歷史事實說話，並期許由前現代東亞案例所證實的大小國互動規則可以延伸到當代世界。我們發現，在 6 世紀中葉至 7 世

臺灣大學 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紀中葉突厥－隋唐的權力轉移週期內，崛起國隋、唐的行爲受到大國權力對比的深刻形塑。塔里木城邦與高昌這組最相似案例拒絕了基於文化親和度的假說。

本研究專注既有文獻鮮少討論的「大對小」視角，從大國關係的理論資源汲取養分，將不對稱關係納入權力轉移的脈絡中考察。研究結果證實了基於權力的解釋，但本文的發現不止於簡單複述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更經由細緻梳理案例產出具體的理論貢獻。其一，現實主義各派圍繞霸權國與崛起國誰是修正主義者、誰先發動戰爭的長久歧見得到某種程度的化解與調和。案例證明，大國的目標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以權力分配定義的國際形勢改變，權力轉移中的大國也會時時根據自己與對手的權力對比判斷勝算，從而調整戰略姿態。即使決策者誤判，結構依然發揮宰制力量，懲罰誤判者並矯正其認知與行爲。簡言之，欲理解大國的整體戰略，不能脫離特定的權力形勢。其二，歷史細節也爲「大國權力對比→大國相互攻守傾向→大國對小國政策基調」這條因果鏈提供證據，從而產生一種連接「大對大」和「大對小」的機制。該連接目前還相當粗糙，不過在作者蒐集的既有文獻中，並無前人言及相似邏輯。這是本文微薄卻重要的創新，且容敝帚自珍，後續進一步檢驗、充實、發展。[28]

突厥－隋唐案例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前現代中國的特殊性，這對於有志以中華文化資源滋養「中國學派」、挑戰或補充西方理論的研究者而言，無疑不是喜訊。其實，隨權力對比調整政策的論述在中國古代屢見不鮮。如《周書・異域傳》評論：「《易》稱『見幾而作』，《傳》雲『相時而動』。夫時者，得失之所系；幾者，吉凶之所由。況乎諸夏之朝，治亂之運代有；戎狄之地，強弱之勢無恒。若使臣畜之與羈縻，和親之與征伐，因其時而制變，觀其幾而立權（令狐德棻，1971：921）。」王安石也曾向宋神宗奏對：「先王於夷狄，力不足則事之，力同則交之，力有餘則制之（李燾，1979：5378）。」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本文的發現再度提醒，中華文化豐富多元，

[28] 本文用相符程序（congruence procedure）與受控比較（controlled comparison）進行跨（子）案例研究，初步確認了因果關聯（或僅是相關），欲完善推論，後續既需要以同時期其他小國及不同時期其他權力轉移週期的更多案例檢驗假說，也需要充實因果機制的各環節，使用過程追蹤（process-tracing）實現深入的案例內研究。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研究者應廣泛探尋各種流派與觀點，深入廟堂精英的決策過程，才能更全面眞實地理解傳統中國的對外行爲。由於採用以權力途徑爲基礎、加入文化因素的檢驗方式，我們的結果不能否證文化典範，更無臧否「中國理論」或「西方理論」的野心。而且，我們提取「文化親和度」並給出一種推論方向，也不能否認基於其他因素或其他邏輯的文化解釋。另一項被更多研究重視的因素是文化的內容本身，具體而言便是中華文化仁愛、和諧、克制的特徵。循此可能產生的推論是，中華王朝或者廣義「中國」比其他大國更多採用和緩的政策。欲檢驗該因素的效力，研究者需要作另一種受控比較，觀察中華王朝與非中華大國（例如本案例中的突厥）在相似的權力位置下（意味著不同時段）對小國政策。不過，無論提取何種概念，進行何種推論，以解釋爲目的的努力都不能偏廢實證，選擇案例更應跳脫明清兩代朝鮮、越南的窠臼，將視線投向更長久的時間與更廣闊的空間。

追尋歷史的目的終究是啓迪現實，從前現代國際關係所得出的結論，於當今究竟有多少適用性，以古鑒今的跨時機制又是什麼，實乃複雜而宏大的問題，恐非數篇論文、單一學科所能解決。僅就本文而言，連接古今的機制是相似的國際背景脈絡——權力轉移。在歷史案例與美中競逐之間這項關鍵相似處的基礎上，我們從「溫和普世主義」的立場出發，探討些許實務啓示。歷史上，隋唐不僅多次與突厥爆發戰爭，更對諸多小國發動一波又一波的征伐，這與今日中國反覆申明的外交道路扞格難容。其實，大國爭霸是權力轉移的必然產物，無論崛起國是否具有挑戰意圖，都會引起霸權國的恐慌與反制，被迫捲入競逐。兩集團化是兩極化大勢所趨，爭取小國、組建陣營也是大國崛起的必由之路。由體系結構決定的大國政治不隨行爲體意志而轉移，崛起國應該卸下「修正主義者」的道德包袱。案例也證明，隋唐兩朝都是在確立絕對優勢乃至滅亡東突厥後，才開始推進霸權工程。反觀今日，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總量日益接近，但軍事權力還差距懸殊。或可預見，中國還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對美國的守勢與對小國的和緩政策基調。而且，在當今世界，核武器令大國間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國現在壓制中國的主要手段是沒有硝煙的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即便將來中國積累了充足權力，也可能通過更和平的方式挑戰美國。同樣，兼併領土的征服已不再爲國際社會所接受，中國亦可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能使用其他手段爭取小國追隨。我們相信，行爲體的選項雖遭壓縮，但攻勢與守勢的分類、從和緩到強硬的光譜以及從「大對大」到「大對小」的因果鏈依然具有分析價值，前現代的行爲會以其他面貌在當代重現。而在文化因素方面，前現代東亞體系文化色彩濃厚，國際規範主要來自中國，但傳統中國不因文化親和度而改變政策；當代世界體系文化色彩較稀薄，國際規範又多源自歐美，循此推測，當代中國的政策更不可能受文化親近性左右。對於在大國政治夾縫中求生的小國，本文的實務意涵則在於提醒它們審時度勢、未雨綢繆，及時判斷大國的政策方向，規劃應對措施，爭取少一分彷徨失措，多一分堅定從容。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中國歷史大辭典編纂委員會，2000，《中國歷史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The Codification Committee of Chinese History Dictionary. 2000. *Zhongguo lishi dacidian* [*Chinese History Dictionary*].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王　棟，2018，〈國際關係中的對衝行爲研究——以亞太國家爲例〉，《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10): 21-49。Wang, Dong. 2018. “Guoji guanxi zhong de duichong xingwei yajiu—yi yatai guojia wei li” [Hedg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s of the Asia Pacific Countries].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18(10): 21-49.

王　欣，2013，〈高昌漢人的族群認同〉，《西域研究》，2013(4): 58-66。Wang, Xin. 2013. “Gaochang hanren de zuqun rentong” [Ethnic Identity of Han People in Gaochang]. *The Western Regions Studies* 2013(4): 58-66.

王俊評，2018，〈天下觀、合法性與華夏文明的內政導向戰略文化〉，吳玉山（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45-80。Wang, Jyun-ping. 2018. “Tianxiaguan, hefaxing yu huaxia wenming de neizheng daoxiang zhanlue wenhua” [Tianxia Worldview, Legitimacy and the Domestic-oriented Strategic Culture of Chinses Civilization]. In *Zhongguo zaiqi: lishi yu guoguan de duihua* [*Resurgence of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 Wu, Yu-sh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45-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令狐德棻，1971，《周書》，北京：中華書局。Linghu, Defen. 1971. *Zhou shu* [*Book of the Northern Zho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古怡青，2002，《唐代府兵制度興衰研究：從衛士負擔談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Ku, I-ching. 2002. *Tangdai fubing zhidu xingshuai yanjiu: cong weishi fudan tanqi* [*The Vicissitude of the Imperial Army System in Tang Dynasty: Starting from the Burden of Guards*]. Taipei: Sin Wun Fong Press.

史爲樂（主編），2005，《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Shi, Weile, ed. 2005. *Zhongguo lishi diming dacidian* [*Dictionary of Chinese Historical Place-nam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1956，《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Sima, Guang, ed. 1956. *Zizhi tongjian*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Commented by Hu Sanx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余太山（主編），2003，《西域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Yu, Tai-shan, ed. 2003. *Xiyu tongshi*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Zhengzhou: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臺北：正中書局。Wu, Yu-shan. 1997. *Kangheng huo hucong: liangan guanxi xin quan* [*Balancing or Bandwagon: A Novel Explanation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ipei: Cheng Chung Book.

吳玉山，2011，〈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蔡政文、明居正、包宗和等（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頁 389-415。Wu, Yu-shan. 2011. “Quanli zhuanyi lilun: beiju yuya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 Tragic Prophecy?]. In *Guoji guanxi lilu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ds. Tsai, Cheng-wen, Chu-cheng Ming, & Tsung-he Pao. Taipei: Wu-nan Book, 389-415.

吳玉山，2012，〈權力不對稱與兩岸關係〉，包宗和、吳玉山（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頁 31-32。Wu, Yu-shan. 2012. “Quanli bu duichen yu liangan guanxi” [Power Asymmetry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Chongxin jianshi zhengbian zhong de liangan guanxi lilun* [*Revisiting Theories on Cross-Striate Relations*], eds. Wu, Yu-shan & Tsung-he Pao. Taipei: Wu-nan Book, 31-32.

吳玉山，2018，〈歷史與國關〉，吳玉山（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3-22。Wu, Yu-shan. 2018. “Lishi yu guogua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Zhongguo zaiqi: li sh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yu guoguan de duihua [*Resurgence of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 Wu Yu-sh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3-22.

吳玉貴，1998，《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Wu, Yu-gui. 1998. *Tujue hanguo yu suitang guanxishi yanjiu* [*The Relations between Turkic Khanates and Sui-Tang Dynasti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吳兢著，駢宇騫譯註，2011，《貞觀政要》，北京：中華書局。Wu, Jing. 2011. *Zhenguan zhengyao* [*Essentials about Politics from the Zhenguan Reign (627-649)*]. Translated and commented by Pian, Yuq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李 燾，1979，《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Li, Tao. 1979. *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 [*Sequel and Extension for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李世民，1983，〈伐龜茲詔〉，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頁101-102。Li, Shimin. 1983. “Fa qiuci zhao” [Qiuci Expedition Edict]. In *Quan tang wen* [*The Whole Collection of Tang Period Literature*], eds. Dong Gao et a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01-102.

李揚帆，2015，〈「中華帝國」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被誤讀的天下秩序〉，《國際政治研究》，2015(5): 42-43。Li, Yangfan. 2015. “‘Zhonghua diguo’ de gainian ji qi shijie zhixu: bei wudu de tianxia zhixu”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Empire”and Its World Order: A Misinterpreted Tianxia Order].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5(5): 42-43.

周偉洲，2006，《吐谷渾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Zhou, Weizhou. 2006. *Tuyuhun shi* [*A History of Tuyuhun*].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孟憲實，2012，〈于闐：從鎮戍到軍鎮的演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4): 120-128。Meng, Xian-shi. 2012. “Yutian: cong zhenshu dao junzhen de yanbian [Khotan: A Shift from Garrison Station to Garrison Town].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4): 120-128.

尚會鵬，2013，《心理文化學要義：大規模文明社會比較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Shang, Huipeng. 2013. *Xinli wenhua xue yaoyi:*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daguimo wenming shehui bijiao yanjiu de lilun yu fangfa [*Psycho-Culturology: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arge-Scale Literate Civilizatio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尚會鵬、游國龍，2010，《心理文化學：許烺光學說的研究與應用》，臺北：南天書局。Shang, Huipeng & Guolong You. 2010. *Xinli wenhua xue: Xu langguang xueshuo de yanjiu yu yingyong* [*Psycho-Culturology: The Researches and Applications of Francic L. K. Hsu's Theory*]. Taipei: SMC Publishing.

林　幹，2007，《突厥與回紇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Lin, Gan. 2007. *Tujue yu huihe shi* [*A History of Turks and Uyghurs*]. Hohhot: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范　曄，1965，《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Fan, ye. 1962. *Hou han shu* [*Book of the Later H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凍國棟，2002，《中國人口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Dong, Guodong. 2000. *Zhongguo renkou shi, di er juan: suitang wudai shiqi* [*Population History of China, vol. 2: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時殷弘，2011，〈武裝的中國：千年戰略傳統及其外交意蘊〉，《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6): 4-33。Shi, Yinhong. 2011. "Wuzhuang de zhongguo: qiannian zhanlue chuantong ji qi waijiao yiyun" [China in Arms: The Millennial Strategic Traditions and Their Diplomatic Implications].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11(6): 4-33.

班　固，1962，《漢書》，北京：中華書局。Ban, Gu. 1962. *Han shu* [*Book of the Former H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秦亞青，2008，《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衝突中的支持行爲（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Qin, Yaqing. 2008. *Baquan tixi yu guoji chongtu: meiguo zai guoji wuzhuang chongtu zhong de zhichi xingwei (1945-1988)* [*Hegemonic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e Support of US in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1945-1988)*].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秦亞青，2012，《關係與過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文化建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Qin, Yaqing. 2012. *Guanxi yu guocheng: zhongguo guoji guanxi lilun de wenhua jiangou* [*Relationship and Proces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anghai: Shangha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馬長壽，2006，《突厥人和突厥汗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Ma, Changshou. 2006. *Tujueren he tujue hanguo* [*Turks and Turkic Khanate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張文才，1998，《中國軍事通史・第九卷・隋代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Zhang, Wencai. 1998. *Zhongguo junshi tongshi, di jiu juan: suidai junshi shi* [*A General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vol. 9: Military History of Sui Dynasty*].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Press

張安福，2013，〈西域都護府烏壘城遺址考〉，《齊魯學刊》，2013(3): 51-56。Zhang, Anfu. 2013. "Xiyu duhufu wuleicheng yizhi kao [A Study on the Remains of the Safeguard City in the Western Region, WuLei City]. *Qilu Journal* 2013(3): 51-56.

張登及，2015，〈東亞再理論化：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發展中程評估〉，楊昊（主編），《東亞的理論與理論的東亞》，臺北：洪葉文化，頁 127-164。Chang, Teng-chi. 2015. "Dongya zai lilun hua: guoji guanxi lilun 'zhongguo xuepai' fazhan zhongcheng pinggu" [The Re-theorization of East Asia: A Midterm Evaluation to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Dongya de lilun yu lilun de dongya* [*Theories of East Asia and the Theoretical East Asia*], ed. Yang Hao. Taipei: Hungyeh Book, 127-164.

陳欣之，2010，〈霸權治理的省思：權力消長與權威起伏〉，《問題與研究》，49(1): 59-85。Chen, Hsin-chih. 2010. "Baquan zhili de xingsi: quanli xiaozhang yu quanwei qifu" [Reviewing the Hegemonic Governance: Power Downfall and Authority Eroding]. *Issues & Studies* 49(1): 59-85.

陳欣之，2011，〈崛起，挑戰與承繼霸權——崛起強權參與建構國際制度過程的觀察〉，《問題與研究》，50(4): 63-88。Chen, Hsin-chih. 2011. "Jueqi, tiaozhan yu chengji baquan: jueqi qiangquan canyu jiangou guoji zhidu guocheng de guancha" [Rise, Challenge, and Transfer Hegemony: The Rising Power's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Intemational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Issues & Studies* 50(4): 63-88.

陳國燦，2008，〈唐安西四鎮中「鎮」的變化〉，《西域研究》，2008(4): 16-22。Chen, Guocan. 2008. "Tang anxi sizhen zhong 'zhen' de bianhua" [Changes of "Zhen" (Garrison Command) in the Four Garrison Commands of Anxi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Western Regions Studies* 2008(4): 16-22.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　原，2017，《大國無戰爭時代的大國權力競爭（行爲原理與互動機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Yang, Yuan. 2017. *Daguo wu zhanzheng shidai de daguo quanli jingzheng (xingwei yuanli yu hudong jizhi)*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ra of Great Power Peace: Behavior Principles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楊　原、曹　瑋，2015，〈大國無戰爭、功能分異與兩極體系下的大國共治〉，《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8): 29-65。Yang, Yuan and Cao Wei. 2015. “Daguo wu zhanzheng, gongneng fenyi yu liangji tixi xia de daguo gongzhi” [Great Power Peace,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Pole’s Co-governance Under Bipolar Systems].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15(8): 29-65.

楊仕樂，2017，〈東亞朝貢體系的實驗檢證：朝鮮的案例研究 1618-1637〉，《問題與研究》，56(1): 53-79。Yang, Shih-yueh. 2017. “Dongya chaogong tixi de shiyan jianzheng: chaoxian de anli yanjiu 1618-1637”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East Asian Tribute System: A Case Study of Korea 1618-1637]. *Issues & Studies* 56(1): 53-79.

楊仕樂，2018，〈崛起中國的權力政治或文化認同？歷史上中韓關係的實證檢驗：1368-1449〉，《遠景基金會季刊》，19(1): 109-155。Yang, Shih-yueh. 2018. “Jueqi zhongguo de quanli zhengzhi huo wenhua rentong? lishi shang zhong han guanxi de shizheng jianyan: 1368-1449”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a’s Ris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Chinese-Korean Relations 1368-1449]. *Prospect Quarterly* 19(1): 109-155.

楊希義、于汝波，1998，《中國軍事通史・第十卷・唐代軍事史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Yang, Xiyi & Yu Rubo. 1998. *Zhongguo junshi tongshi, di shi juan: tangdai junshi shi shang* [*A General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Military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vol. I*].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Press.

溫大雅，1983，《大唐創業起居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Wen, Daya. 1983. *Datang chuangye qiju zhu* [*Imperial Di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Great Ta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萬　曉，2017，〈朝貢的名實與朝貢之外的東亞——分類框架、案例舉隅與研究建議〉，《國際政治科學》，2017(3): 70-111。Wan, Xiao. 2017. “Chaogong de mingshi yu chaogong zhi wai de dongya—fenlei kuangjia, anli juyu yu yanjiu jianyi” [Nominal and Actual Tribute Relations and East Asia Beyond Tribute: A Typology Framework, an Instanced Case and Some Research Sugges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7(3): 70-111.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葛兆光，2017，《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Ge, Zhaoguang, 2017. *Lishi Zhongguo de nei yu wai* [*The "Interior" and the "Exterior" in Historical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劉 昫，1975，《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Liu, Xu. 1975. *Jiu tang shu* [*Old Book of T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歐陽修、宋 祁，1975，《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Ouyang, Xiu & Song Qi. 1975. *Xin tang shu* [*New book of T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閻學通，2015，《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Yan, Xuetong. 2015. *Shijie quanli de zhuanyi: zhengzhi lingdao yu zhanlue jingzheng* [*The Transition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閻學通，2018，《道義現實主義與中國的崛起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Yan, Xuetong, 2018. *Daoyi xianshi zhuyi yu zhongguo de jueqi zhanlue* [*Moral Realism and the Strategy for Rising Chin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薛宗正，1992，《突厥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Xue, Zongzheng. 1992. *Tujue shi* [*A History of Turk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薛宗正，1993，〈唐代安西建置級別的變化、反復與安西四鎮的棄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3(4): 44-53。Xue, Zongzheng. 1993. "Tangdai anxi jianzhi jibie de bianhua, fanfu yu anxi sizhen de qifei" [The Changes and Repetitions of the Anxi Institutions in Tang Dynasty and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Anxi Four Towns].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1993(4): 44-53.

薛宗正，2008，〈從西部突厥到西突厥汗國〉，《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36(1): 60-72。Xue, Zongzheng. 2008. "Cong xibu tujue dao xitujue hanguo"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West of Turk Empire and Western Turk Empire].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36(1): 60-72.

薛宗正，2011，〈安西大都護府治所考——兼論豆勒豆爾奧庫爾古建築群〉，《史學集刊》，2011(3): 3-22。Xue, Zongzheng. 2011. "Anxi da duhufu zhisuo kao—jian lun douledoueraokuer gu jianzhuqun"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Government Office of Anxi Grand Duhufu].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tudies 2011(3): 3-22.

魏　徵、令狐德棻，1973，《隋書》，北京：中華書局。Wei, Zheng & Linghu Defen. 1973. *Sui shu* [*Book of Su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譚其驤（主編），1982，《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Tan, Qixiang, ed. 1982. *Zhongguo lishi dituji, di wu ce: sui, tang, wudai shiguo shiqi* [*Atlas of Chinese history, vol. 5: Sui,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Period*]. Beijing: China Car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蘇軾撰，孔凡禮點校，1986，《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Su, Shi. 1986. *Sushi wenji* [*Su Shi Anthology*]. Punctuated and collated by Kong Fan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二、西文部分

Allison, G.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Art, R. J. 2010.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 Hau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25(3): 359-391.

Biddle, S. 2001. "Re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of Offense-Defense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3(3): 741-774.

Blackwill, R. D. & A. J. Tellis. 2015. "Revising U. 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pecial Report No. 72." in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Tellis_Blackwill.pdf. Latest update 06 October 2019.

Bobrow, D. B., ed. 2008. *Hegemony Constrained: Evasion, Modification, and Resistanc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Buzan, B. & R. Little. 2000.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r, E. H. 1964.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Ciorciari, J. D. 2008. "The Balance of Great-Power Influence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9(1): 157-196.

Copeland, D. C. 2000.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ittmer, L. 1981.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33(4): 485-515.

Dittmer, L. 1987.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ed. Ilpyong J. Kim.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 29-47.

Edelstein, D. M. 2017. *Over the Horizon: Time,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lman, C. & M. Jensen, eds. 2014. *The Realism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Fairbank, J. K., ed. 1968.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h, E. 2007.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3): 113-157.

Huang, Chiung-chiu & Chih-yu Shih. 2014. *Harmonious Intervention: China's Quest for Rel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Routledge.

Jackson, V. 2014. “Power, Trust, and Network Complexity: Three Logics of Hedging in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14(3): 331-356.

Johnston, A. I. 1998.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ng, D. C. 2007a. “Hierarch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00-1900.”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eds. Stuart J Kaufman, Richard Little, & William C Wohlfort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227.

Kang, D. C. 2007b.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ang, D. C. 2009.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9(1): 1-28.

Kang, D. C. 2010.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issinger, H. A. 1957.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Koga, K. 2017. “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 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 640-642.

Kuik, Cheng-chwee.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0(2): 159-185.

Mearsheimer, J.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委託版

Norton & Company.

Mearsheimer, J. J. 2010.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4): 381-396.

Morgenthau, H. J. 2006.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Boston: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Nye, J. S. 2010.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89(6): 2-12.

Pence, M. 2018.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i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Latest update 06 October 2019.

Rapkin, D. P., W. R. Thompson, & J. A. Christopherso. 1979. “Bipolarity and Bipolarization in the Cold War Era: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3(2): 261-295.

Rihoux, B. & C. C Ragin. 2008.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Ripsman, N. M., J. W. Taliaferro, & S. E. Lobell. 2016.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y, D. 2005.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7(2): 205-322.

Schweller, R.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72-107.

Snyder, G. H. 2007.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ammen, R. L., J. Kugler, D. Lemke, A. C. Stam III, M. Abdollahian, C. Alsharabati, B. Efird, & A. F. K. Organski. 2002.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Tang, Shiping. 2010.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Spring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Latest update 06 October 2019.

Walt, S. M. 1990.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 N.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ecurity 25(1): 5-41.

Waltz, K. N. 2010.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Wang, Yuan-kang. 2011.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endt, A. 2014.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mack, B. 2003. "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6(2): 92-119.

Womack, B. 2006.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mack, B. 2009. "Recognition. Deference. and Respect: Generalizing the Lessons of an Asymmetric Asian Order."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 16(1-2): 105-118.

Womack, B. 2010. *China Among Unequals: Asymmetric Foreign Relations in Asia*. Hackensack: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Womack, B. 2016. *Asymmet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u, Yu-shan. 1996. "Exploring Dual Triangl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pei-Washington-Beijing Relations." *Issues & Studies* 32(10): 26-52.

Wu, Yu-shan. 2005. "From Romantic Triangle to Marriage? Washington-Beijing-Taipei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Comparison." *Issues & Studies* 41(1): 113-159.

Wu, Yu-shan. 2011. "Power Shift, Strategic Triangle, and Alliances in East Asia." *Issues & Studies* 47(4): 1-42.

Yang, Yuan. 2018. "Escape both the 'Thucydides Trap' and the 'Churchill Trap': Finding a Third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under the Bipolar System."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1(2): 193-235.

Zhang, Feng. 2015. *Chinese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Zhang, Tiejun. 2002.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21(2): 73-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Rise of a Great Power and the Silk Road Wars: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a Rising China towards the Serindia City-States during the Turks vs. Sui-Tang Power Transition Period*

*Wan Xiao***

Abstract

In a world suffering from the incremental pressure caused by the transition of powe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behaviour of the rising power is becoming a significant issue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what policies the rising power chooses to have towards different small countries and why it adopts them. We organize the factors based on the competitive perspectives of power and culture into one framework, and then test the hypotheses by analyzing the asymmetric interactions that happened during the power transition period between the Turkic Khanates vs. Sui-Tang China. The policies of Sui-Tang China implemented on the oasis city-states in Serindia (Xiyu) confirm the material logic: the power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giants determined the rising power's strategic tendency when facing the hegemon, which then generated the keynote of its policies for treating the small countries. However, the hypothesis involving cultural affinity is denied by the most-similar sub-cases of the Tarim states and Gaochang.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before China overtakes the US, it will keep a defensive strategic posture towards the US and adopt moderate policies towards lesser powers.

Keywords: Power Transition, Asymmetric Relations, East Asia System, Sui-Tang, Serindia

---

* DOI:10.6166/TJPS.202003_(83).0001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rinchengyatso1990@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4 大國崛起與絲路烽煙： 萬 曉
從隋唐經營西域看權力轉移下崛起國對小國的政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